

雙普選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爭議難題



台灣人民反對《反分裂國家法》

中共能否建成和諧社會？

今日的中國婦女 民眾反日 政府壓制！

歐洲社會論壇：奪取政權以改變世界！

書評：新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

不斷革命在新世紀的相關性

唯有實行雙普選， 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爭議和難題！

本刊評論員



董建華終於下台了！

這是人民發揮力量的勝利！

儘管他一直拒絕港人要他下台的正確訴求，堅說要做到07年中第二屆任期完結為止；但他的統治無能，施政不斷失誤，在他帶領下的一些負責官員專橫霸道（如前保安局長葉劉），或者涉嫌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損公肥私（特別表現在房屋批地上面）：這一切都導致民眾怨憤日益加劇。早在03年7.1的50萬人大遊行時，市民已經激昂地喊出「董建華下台」的呼聲了；其後的反對聲音此起彼落。市民不滿的巨大壓力，是迫使他很難再支撐下去的基本原因。

北京高層也應已感受到港人的強烈不滿，國家主席去年要他「查找不足，提高執政管治能力」，並把這些訓話公開出來，已透露出中央對董的不滿。這次的請辭，不管是否部份由於中央的勸退或迫使，但不加挽留至兩年後任滿，也可反映北京的真意。

事實充份證明：像董建華這樣無能的人，居然能在當時得到中央的重用，經歷頭5年的証驗之後，還要由小圈子「選」他連任；這暴露出京方用人及其小圈子推選安排和任意操縱的錯誤。

董辭職後，新特首人選是北京早已計劃安排的重要問題，他們自然會估計到熱門人物之一是曾蔭權，他有較高的治理經驗，但也是港英長期培訓出來的「遺臣」，能否作出徹底的轉變，對中央百分百忠心，完全依從京方的意旨施政，這是不能預先絕對信賴的。如果他經過一個時期的考驗和觀察，証明是有問題的，則依法做足5年，就太長了。可能因為有這種顧慮，倒不如改定出一個短的「過渡期」（或者甚至像有些人說的「試用期」），在此期間，讓「愛國愛黨」的民建聯有時間作好準備接班，使其候選人在07年的小圈子推選中成為新的特首，早些變成執政黨。由此顯出人大釋法的別有用心和肆意操縱香港的事務。

出於這種政治的需要，和「黨大於法」的傳統觀念，北京高層解釋這次是補選董5年任期餘下兩年的特首。因此，這實際上是對基本法原本沒有的規定加以修改，而不依照第46條的明文規定：選出的特首任期5年。

但北京這樣縮短任期，與香港法律界和港府過去對普通法及基本法的一貫理解，是非常不同的。香港絕大多數的法律界人士、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以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政協委員

馮華健、人大代表溫家璇、鄺維庸和最初表態的吳康民等親京人士，都認為任期應該是《基本法》第46條規定的5年。

也因為如此，特區政府2001年頒布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訂明，行政長官任內去職，繼任者任期5年。這條例送交人大常委會，未有駁回，顯然已獲得首肯。

2001年，立法會審議《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亦有討論這問題，並同意缺位與屆滿後選出的特首，任期都是5年。去年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答覆劉慧卿的質詢也很清楚地說：「《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的任期為5年。這規定適用於任何行政長官，不得有例外情況。」林又說：「任何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以規定一個有別於5年的任期，均不符合《基本法》」。

只有緊跟北京的譚慧珠、曾鈺成等人才支持中央的兩年任期主張。律政司司長在揣摩上意後，根據內地御用「學者」、護黨而非真正護法的「法律專家」的歪理，便改變過去意見，著文解釋港府之轉變立場，是基於尊重法治。這其實是相反。她提出的論調，已給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詳加批駁；律師公會發表的聲明也認為，把任期改為兩年，欠法理依據；今年7月選舉出來的特首，任期應是五年。

香港特區政府後來動用行政手段，把2001年訂立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訂，加添餘下任期為兩年的新條文，並提請人大常委會再作釋法。京方也有意讓港方主動提出釋法。

這樣做法，實則是以一些人的政治需要和改變意見來改變法律，是內地的人治傳統又一次表現，從而損害了香港的法治基礎和制度。

在新特首的人選問題上，昔日的保皇黨與港府主要高官之間又立即展開了明爭暗鬥。當曾蔭權依

法作為署理行政長官，召開首次行政會議時，行會的四名成員（民建聯的曾鈺成、工聯會的鄭耀棠、和梁振英等）卻不肯返港出席，「理由」是留京投票選董為政協副主席，雖然明知董已穩得接近全票。他們似乎以此表現向曾實施「下馬威」，反映他們對署理特首的不很合作心態。不久，梁振英又公開指責，香港政府「是唯一不去推薦自己專業服務的政府」，對加強中港經貿合作的推動工作不足夠。據學者蔡子強分析，梁的批評看來矛頭直指署理特首曾蔭權及財政司長唐英年，「過去幾年，曾蔭權主要負責打通香港與內地經脈，如『9+2泛珠三角合作』等。這樣只會令市民再度聯想到他們二人不和的消息。」（3月22日《明報》）

今天，在行政會議重要成員之間不協調，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等不和已經出現。在7月選舉之後，即使曾蔭權被小圈子選為特首，但是，作為領導班子的行政會議內部的爭鬥仍會持續。

不過，縱令是小圈子選舉或補選，港人無奈之餘，也不願再見到無對手競選，無施政綱領，而由中央屬意便「自動當選」的醜劇重演。

從董建華的無能治港和半途下台，到繼任人選及其任期的爭議，到第3次釋法再給香港帶來的損害，等等，都從反面証明民主政制對香港的特別必要性和迫切性，証明廣大市民一直要求07、08雙普選的正確性。唯有這樣實行雙普選，才能產生有能力、孚眾望、真正為市民服務的特區行政長官，合理而有效地解決香港存在的各種困難問題。

港人的強烈要求和巨大壓力，已經迫使董建華下台了；今天仍須繼續乘勝邁進，再接再厲，爭取07、08雙普選的實現，不達目的不罷休！

2005年4月10日

《十月評論》更改網址【修訂啟事】

本刊網址(web site)已由 <http://www.octreview.org/>
更改為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敬請各位留意，謝謝！

《反分裂國家法》大受台灣人民反對

振言

在05年3月的人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分裂國家法》，由人大蓋上了橡皮圖章，一致通過成為法律。

這部法律的第八條定出了三個條件，只要其中之一出現，便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意味着包括戰爭方式）對付。這些條件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是為着將來大陸軍方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制定法理依據，從而企圖阻遏台灣當局有任何台獨的言行。

台灣陸委會發言人批評，這3個條件的詮釋定義權，完全掌握在北京當局手上，用「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以法律層次處理台海問題，又欠缺跟進的機制，形同「動武空白授權書」。

儘管溫家寶解答記者問題說：「這不是針對台灣人民的一部法律」；在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時，國家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和其他正當權益，減少損失；可是，如果真的向台灣發動戰爭，則戰火無情也無「眼睛」，是很難不傷害到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的，縱使已加上「盡最大可能保護」他們的字眼。

雖然此法的條文比江澤民當政時發佈的2000年《對台白皮書》在文字上比較「寬鬆」，沒有再採用包括軍事行動的字句，胡錦濤在通過此法之前，又拋出軟的一手，提出企圖安撫台灣人民的「四個決不」，但這一切都不能收到中共的預期效果。在通過此法之後，台灣的民調顯示，台灣仍有56%的民眾對中共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反感，47%的民眾贊成採取遊行、公投或立法的方式來反制。

這表明，台灣人民生活在較民主、自由的社會裡，眼睛更為雪亮，辨別力更強，一般是不會輕信中共官方的甜言的。

北京在通過之後，強調這是和平法，但西方國

家却表示憂慮，認為是戰爭法，北京解釋此法遏制了台獨，而台獨會導致戰爭。可是，在人大通過此法後，台灣《中國時報》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立場傾向獨派的民眾，比例從早先的一成八，上升到二成三，升幅達27%，顯示中共立法原意要遏制台獨，但效果卻適得其反，恰恰是助長了更多台人的獨立意念和訴求。

最能夠表現台灣民眾對此法的反對態度的，就是3月26日的大遊行。據報導，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行，由民進黨等500多個政黨和社團（大部份的立場傾向台獨）組成「民主和平護台灣大聯盟」發起和主導，主辦者宣稱有100萬人參加。（《文匯報》報道：台北市長馬英九稍早引述〔作為政敵的他統領下的〕警方估計，參加人數約24萬人，台北市警局保安科後來估算，遊行人數為27.5萬人。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說，3.26大遊行遠超歷次規模，百萬人的數字絕不誇張。）大遊行的主要口號是「保民主」、「要和平」、「護台灣」；大會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企圖以此減少綠營的色彩。

在通過此法之前，美日政府確定了把台海問題列為美日的共同戰略目標之一，即把台海納入兩國安保目標的涵蓋目標範圍內。北京的反應是：美日在圍堵中國。如果台灣2,300萬人民同情大陸，反對日美的威脅，則北京可以得道多助；但「反分裂法」却製造了龐大台灣民眾對北京的反感，甚至敵對情緒。

歐盟在此法通過後，曾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任何使用武力的行為。雖然北京努力爭取歐盟解除禁售武器（這項禁令是直接因6.4鎮壓而對中國採取的），但通過「反分裂法」後，情勢生變，歐盟已經決定推遲六月底前解禁計劃。而多名歐盟外交官低調表示，受北京通過反分裂法及美國施加強大壓力影響，歐盟原訂在六月底前解禁的時間表，極可能有變。（3月23日《蘋果日報》）

北京曾經向台灣人民許諾：在兩岸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不過，香港在回歸後發生中央與港人之間的許多爭

議，尤其是人大常委會的幾次釋法，被視為是一國壓香港一制，損害了香港的法律制度，以至高度自治，給台灣民眾對北京「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說法，增加了不信任和疏離感。

在「反分裂法」遭到多方反對或不良反應後，中共相繼邀請台灣國、親兩黨的連戰和宋楚瑜到北京會談，以示友好而緩和緊張氣氛，重施統戰故技，分化台灣政治勢力，孤立民進黨陳水扁和台聯。連、宋也立即接受，企圖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但給予他們帶回台灣的「禮物」，將會主要是經濟方面的（例如減免某些農產品的進口稅等）。而他們的訪京，得到中共的特別優待，即使可能緩和因「反分裂法」造成的兩岸緊張關係，但也不能完全消除該法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廣大台

灣人民心目中，這些都是北京「一手硬一手軟」、一手持劍、另一手搖橄欖枝的兩面手法。中共現任領導人大倡「以民為本」的「新三民主義」，這個「民」本應該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北京必須真正尊重台灣人民的自主等基本權利的，但「反分裂法」通過後，台灣人民却感到戰爭的威脅，這與「以民為本」的宣示全相矛盾。中共現時反而只求拉攏連戰等上層政客，如果與國民黨達成第三次國共合作，最後仍多份會以失敗收場，而不會與過去兩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收場完全相反，特別是在「合作」雙方的力量對比非常懸殊的條件下。發展如何，且讓歷史來作見證吧！

2005年4月26日

民眾反日 政府壓制

軍行

自發的行動

在3、4月的大半個月期間，中國各大城市相繼爆發了民眾自發上街反日等行動，其規模是1989年民運以後最大的。

4月3日在深圳舉行的簽名反日活動，由「廣東愛國者志願網」連同「聯合民族先鋒網、深圳熱線以及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一起發起。這個簽名活動，演變成當地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反日遊行示威（據警方統計，參加者約有5000多人），另有數萬名市民現場簽名。遊行隊伍路經深圳吉之島、西武等日本百貨公司時高喊口號並破壞商店的廣告招牌。據悉，此次遊行事先未獲警方批准，屬自發性質，在長達5小時的遊行中，遊行隊伍與公安及保安多次發生推撞。

4月9日，逾3萬北京市民參加了民間發起組織的反日大遊行活動，以6個多小時 步行20公里，遊行到日本駐華使館前聚集，強烈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佔領釣魚島等，呼籲「抵制日貨」及粉碎日本「常任」夢想等。憤怒的市民焚燒、撕爛日本太陽旗，以石塊、水瓶、雞蛋等擲向日本使館，傳達室的玻璃更被砸破，市民直至深夜仍未全部散去。繼北京爆發近年最大規模反日遊行，反日示威浪潮繼續席捲全國各地。華南的廣州、深圳在10日再有數萬人走上街頭舉行反日示威，在日本企業資相當集中的江蘇蘇州市，昨日同樣出現數千人參加

的反日示威，北京也繼續有上千人在中關村地區舉行反日集會，海口則有萬人簽名運動和遊行。

同一天，佛山市等地也各有示威 遊行，舉行街頭簽名的城市更是很多。

在日本外相4月中訪華前後，雖然中國官方已大力遏制示威，迫使運動降溫，但各地人民仍有大規模反日遊行示威，包括上海和深圳各有10萬人，杭州有逾萬人，香港有1.2萬人，珠海有上萬人。以及瀋陽、西安、廈門等17個城市。

民眾反日的原因

為什麼最近中國會爆發這樣普遍而強烈的反日遊行和簽名抗議呢？這完全是日本政府伙同右翼勢力、為了壟斷大財團的利益，實行政治和軍事的擴張政策，因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所造成的。其一連串具體表現是：一、日當局批准篡改歷史教科書，完全否認侵華日軍犯下的罪行史實，反而把日本發動「9.18」、「7.7」等事變的罪責歸咎於中國；二、以首相小泉為首的官員、議員，不顧各國的反對，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向犯下侵略罪行的甲級戰犯神位致敬，顯示他們要日本民眾以侵略的戰犯為榜樣；三、日政府並沒有像德國那樣明確地對過去的侵略罪行向受害國道歉、謝罪；祇在中國人民反日怒潮高漲時，小泉在亞非會議上才被迫勉強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道歉」，但仍拒絕為

侵略暴行謝罪；四、較早時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把台海列為它們的「戰略防衛範圍」，在反日怒潮中，日政府又授權日商企業開發仍在爭議中的東海油氣田，為中日關係火上添油；五、日政府提出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以助日本達成政治強國的大計；六、在派兵到伊拉克參與美國的侵略罪行之後，日本議會的立法委員會近日又發表報告，建議修訂二次大戰後訂立的憲法，認可日本擁有軍隊作自衛用途的權利，這是一種漸進的軍國主義復辟，以便最後使日本成為經濟、政治、軍事「三位一體」的強國，稱霸亞太地區，對亞洲各國重新形成侵略威脅。

中國人民上街示威簽名，就是為了反對日本政府上述的惡行的。

政府的壓制

中國政府在人民開始遊行反日時，可能想利用來迫使日本政府停止一些不利於中國的政策、措施，因而對民間的行動加以默許，和限制在不致失控的範圍內。但在怒潮越來越洶湧澎湃時，北京當局便本能地憂慮群情可能失控，發展下去，不但會損害中日之間的經濟利益，影響中國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而且部份群眾可能把反對目標轉向，把對社會及當局的不滿發洩出來，變成天安門事件式的對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穩定。

因為如此，中國官方於是採用各種資源與手段為反日聲浪降溫，加大力度止住中日關係的跌勢。除了控制大規模的遊行以及出動宣講團到高校宣講外，還在各地學校組織了一系列活動層層疏導反日情緒，教導學生要冷靜理智、合法有序地表達愛國情感。（4月25日《文滙報》）

李肇星要求中國人民「堅決貫徹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等活動，不做影響社會穩定的事情。」（4月20日《明報》）

官方新華社在4月17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已要求各地區和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要深刻領會最近一次政治局會議的精神，緊緊「抓住當前十分寶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把思想統一到中央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上來，把行動統一到總體部署上來。」

在日本外相到北京訪問的時候，北京當局多管齊下，採取嚴密措施防範再度發生民眾反日集會及遊行活動，確保首都社會穩定大局。當局在敏感地區駐紮重兵，如臨大敵；多間學校要外出的學生登記姓名加以阻嚇；一批被視為可能是反日活動「搞

手」的民間愛國人士，則被送往郊區「休息」。接着中央高層並向全國各地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嚴加控制民眾反日情緒，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以防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再度發生。

蔓延全國各地的示威遊行，雖然在官方短暫默許之下爆發，但很快便受到阻遏。

早在4月12日，全國反日活動急降溫，有份發起深圳4月第一次萬人反日簽名遊行的「廣東愛國者志願網」已被封，無法登入。此外，全國的互聯網突然發生故障，導致各地用戶無法正常登入網站，內地網友紛紛揣測，此事與反日遊行有關。

當局全面封殺網上相關消息的傳播，近期活躍的反日網站被關閉或限制登錄，聊天室將「反日」、「遊行」等敏感詞語列為攔截目標，不少大學也明令嚴禁學生參加遊行。

慣用的「秋後算賬」行動在陸續展開，在本文執筆時止所見到的報道已不少。據4月28日《明報》報道：北京警方調查近期中地尤其是北京民間反日遊行活動的幕後策劃者，矛頭直指向中國民間保釣會與愛國者同盟這兩個民間團體。北京、上海多名保釣會成員近日被警方拘傳，其中上海謝姓保釣會成員已經被正式拘留，另一李姓成員則被帶走後下落不明。23日，警方再前往保釣會總部，並以「刑事傳訊」為名，帶走幾名成員。

據上海東方網報道，上海警方近日拘捕16名涉嫌在本月16日反日遊行示威中的「滋事者」，另有26人被治安拘留。警方是根據在現場拍攝到的電視片段進行拘捕行動的，被捕者涉嫌在遊行期間，向日資商鋪和餐廳投擲石頭及雜物，以及煽動鬧事，其中一被捕者是大學教師，報道說，警方目前仍在追緝其他滋事份子。

民間反日浪潮繼續被壓制：江蘇一名男子在網上鼓動民眾5月1日在南京舉行反日遊行，結果被公安以涉嫌編造、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拘捕。

就這樣，中國各地的民間反日行動，便被官方大力壓了下去，變得沉靜無聲了。

以上對中國民眾愛國行動所遭不公待遇的不完全敘述，如果與日政府對日本右翼份子近期反華言行的寬待甚至縱容相對照，以及與中國政府近日對小泉政府的寬容、友好態度相比較，那就會形成強烈的對比；再如果與中國領導人倡言的「以民為本」、「新三民主義」相提並論，那也會使中國人民又一次認識了領導人的言不符行，上了另一歷史課的！

2005年4月28日

（轉載）新《信訪條例》實施前的「掃蕩」

中國人權新聞稿

中國人權收到國內知情人士的報告，在中國政府即將實施新的《信訪條例》之前，北京、上海、東北等全國許多省市都發生了抓捕、關押、毒打上訪民衆的事件。4月27日中午，上海杜陽明、王麗卿、陳再麗等數十名上訪民衆，離開所居住的旅館前往國務院信訪辦公室，但是行經北京前門一帶時，突然被埋伏於此的100多名警察、7輛警車所包圍。人數眾多的警察粗暴地強制訪民上了公交車，並將他們拉到一個名叫馬家樓的地點關押。在他們之前，此一拘禁地點已經關押有各地訪民600多人，主要是遼寧省、吉林省的民衆，僅僅上海先後被陸續抓來的訪民已經超過100人。上海被抓捕拘禁於此的訪民說，他們的私人財物和重要資料等，都存放在他們所住宿的旅館裏，但是沒有人理睬和解決他們的這一焦慮。知情人士說這是“五一”之前對訪民“大掃蕩”的一部分，據說還將對上訪村等訪民的集聚地進行大規模清理，以配合貫徹新的《信訪條例》的實施，以及“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長假期的社會管理。

全國抓捕訪民阻止進京的事件最近不斷發生，上海警方更是興師動衆不遺餘力地貫徹執行。上海約200多訪民在4月24日乘車進京，大多都帶有多多年上訪不得解決的遭受侵犯迫害問題。但是隨同這些訪民上車的還有100多名警察及信訪辦工作人員，他們在火車開動之後即開始動手抓人。晚上9點多鐘火車經過常州時，警察抓捕並且將70多名上海訪民拖下車。警察和信訪辦的人都是2人抓一個人往下拖，遇到不甘心就此下車的上訪民衆，就會有4—5名警察圍上來拳腳交加、橫拖豎拽扯下車甚至摔下車。訪民中杜陽明、沈詠梅、顧志剛等多人被打傷，杜陽明更被警察肘擊心口打成休克，擡到常州市第一醫院搶救。杜陽明直到第二天才醒過來，而他一醒過來便不顧死活繼續進京上訪。被警察拖拽下車的還包括一對盲人夫妻仇保權和潘一維，他們是“上海首富”周正毅拆遷的東八塊的受害者，目前他們與父母及一個盲兒5個人擠住在一間窄小的房間裏。

上海本次在京上訪的300多民衆以遭到強制拆

遷的個案居多，是上訪民衆中的絕大多數。因為遭受其他迫害而上訪的也有不少，如這次進京上訪的上海居民吳新龍，就是因為1995年被警察刑訊逼供打斷手而上訪多年。這些訪民絕大多數都是長年的上訪者，有些人僅進京上訪就超過30次，已經進京上訪10多次的相當普遍。其中大多數人因為上訪而遭受過抓捕拘禁，有不少人反反覆覆遭受過抓捕拘禁甚至勞動教養。據統計在這次北京被抓關押於馬家樓的100多上海訪民中，單單遭受過勞動教養懲罰的就有杜陽明、田寶成、談蘭英、孫健等7至8人。訪民們說他們可以數出來的因上訪而勞動教養的人，在上海至少有70至80人。訪民說他們已經陷入了求生無路的絕境，遭受嚴重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侵犯不僅投訴無門，而且由於四處投訴進一步遭受迫害。他們這一次進京上訪，沿途就遭到攔截、抓捕、毒打，一些人千辛萬苦才到了北京，還沒有來得及找個政府機構投訴，又被非法抓捕關押起來。關押中還要他們配合攝像錄製證據，否則連飯也不給吃。而且一天一夜一人只給了二個小饅頭，寒冷的夜晚被圈禁在露天的院落裏，不少年邁體弱者已經病倒而無人理睬。他們的上訪之路就是如此周而復始，除了會遭受進一步的迫害可以預見外，沒有任何解決問題和公正的發展能夠預見到。據知情人士告訴中國人權，上海被拘禁在馬家樓的100多訪民，已經於28日下午被警察押解火車站遣返了。

中國人權強烈批評中國政府對訪民採用的非法手段。不論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長假期，還是中國政府5月1日實施的新《信訪條例》，都不是可以對訪民採用這些非法手段的藉口。現在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上訪民衆中的嚴重問題，不僅是中國政府公開承認的80%以上訪民確實遭受了侵犯、迫害得不到公正解決，而且還包括對他們上訪所實施的新的侵犯和迫害。中國人權要求中國政府至少先應該停止對訪民的新侵犯和迫害，尤其應立即停止北京正在進行的對訪民的大規模“清理”。

2005年4月28日

中共能否建成和諧社會？

張開

總攬黨政軍最高領導權的胡錦濤，最近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從全面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他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政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因而要求幹部、黨員把這項建設工作落到實處。

溫家寶接着在向人大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把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2005年工作總體部署的重點之一。顧名思義，這樣的和諧社會，應該比江澤民幾年前提出的「小康社會」更理想、達到更高級發展的境界的，既可享有溫飽的小康生活，又沒有社會階級矛盾衝突的不和諧，幾乎可超越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後者仍只能「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但胡錦濤仍要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而提出的任務之一，亦即認為小康社會比諸和諧社會是更高級發展的。不過，美國早已是小康社會了，其社會是否已經和諧，沒有階級矛盾衝突了呢？中共並沒有解釋。

但不管怎樣，到底這樣的和諧社會，能否在中共的領導和推進之下，帶引中國人民共同構建成功呢？以下想探討這個問題。

市場經濟激發社會更多不和諧問題

中共20多年來的基本路線和政策，是大力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務院在今年2月24日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和要求；發改委為此也具體作出了多個方面政策優惠措施去支持「非公」經濟。《人民日報》在組織相關報道中指出：目前，個體私營工業已佔了全國工業增加值和銷售收入的40%左右，佔全國商品銷售總額和零售總額的60%以上。加上外資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佔GDP的比重已超過一半。僱用的就業人數已佔城鎮就業和整個非農就業人數的大

半。

這些新數據表明，非公有制經濟力量已超越國有制經濟力量，儘管官方仍死撐着「以國有制為主體」的黨八股。這也表明，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力量，已經佔了優勢。中國領導人近年不斷要求外國承認中國的「全面市場經濟」地位，也就是這種現狀的一種反映。

《報告》同時宣佈：中國政府「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繼續降低關稅，擴大開放領域……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這就是拆除了中國過去成為非資本主義的工人變態國家的兩大支柱或必要條件之一（另一支柱是國有財產制）。

多年以來，中國經濟越是蓬勃發展，就意味資本主義經濟越蓬勃發展。而資本主義經濟所必然產生的不良後果（例如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失業、社會矛盾激化等等）和困難問題也越多、越嚴重。

溫家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多少承認了這種惡果；他說：總結一年來的工作，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一是經濟運行中突出矛盾尚未根本解決。農業基礎薄弱的狀況沒有明顯改變，保持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難度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還有可能反彈；煤電油運仍相當緊張；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二是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突出。一些地方特別是廣大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需要解決的問題較多；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差距和部份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部份低收入的人群生活比較困難；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不少。三是一些長期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主要是：就業壓力巨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技術水平低，第三產業發展滯後；投資率持續偏高，消費率偏低；特別是制約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仍很突出。我們很清醒地看到，政府工作還存在不少缺點。政府自身改革和職能轉變滯後，辦事效率不高；有些關係群眾利益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有些政府人員依法行政觀念不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和奢侈浪費

的問題比較突出；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比較嚴重。

他所描述的中國當前問題、困難和政府工作缺點，只是實際存在着的一部份，而且說得隱晦不詳。但儘管如此，他仍披露了中國今天存在的許多不和諧問題。

社會科學院的2004—2005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較具體地指出，有7大問題正困擾着中國的發展，這就是：一、農民失地引起的社會矛盾加劇。目前全國有約4,000萬失地農民。二、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根據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三、就業局面依然面臨長期困難。每年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達到2,400萬人，而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最多900萬個左右。四、減少貧困仍然是新世紀的重任。目前農村的絕對貧困標準是農民年純收入在625元以下，低於人均年收入約900元的聯合國國際貧困測算標準。中國目前正處在減貧的瓶頸階段。五、反腐敗要注重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反腐敗的力度和成本很大，但腐敗大案要案新案仍不斷出現。六、可持續增長受到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嚴重制約。七、社會心態變化。近兩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滿意度卻在下降。（上述的「社會心態變化」，具體表現在「仇富」的人大增。）

「三農」問題仍難有效解決

農村和農民，佔了中國地域和人口的絕大多數。它和他們是否漸趨和諧抑或相反，讓我們看看實際吧！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國價廉質優的農產品大量湧入中國市場，使中國農產品備受打擊，農民生活每況愈下。世界銀行最新報告指出，中國入世3年後，農村家庭平均收入因而減少近一個百分點，部份赤貧農村家庭的生活水平三年內更急跌6個百分點。

「三農」問題的非常嚴重，幾年前已迫使中共領導層列為「重中之重」，要設法加以緩解。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更列出一連串措施去落實這個目標，例如，提前取消各種農產品稅，尤其是農業稅，國家今年的農業投資約700億元，等等。

不過，這些減免措施，即使能略為緩解嚴重形勢，也不能根本解決「三農」問題。中國科學院今年發表的「科學與社會」三大系列指出：唯有靠城市化才能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為此，未來50年中國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將達15—16萬億元人

民幣。（這是中共在建國後一直實行犧牲「三農」利益的政策措施的後果。）

而且，減免這些稅收，也必然遭受地方幹部用「下有對策」來抗拒，以保護他們從中所得利益不致受損害，長期以來，他們正是依靠徵取農民的苛捐什稅等等來肥私養活的。

地方官員的貪污，使國家縱然有專款要扶助農民，農民的實際收益也遠為微少。例如，吉林省一個省級貧窮縣的小村，獲中央下撥十萬元扶貧專款，每戶貧農原可分得五千元，卻被官員侵吞，只剩下每戶五十元，當地人「敢怒不敢言」。（3月23日《蘋果日報》刊載《東亞經貿新聞》報道）

「信訪洪峰」的形成

社會矛盾尖銳化使社會更趨不和諧，其表現之一，是各地民眾權益被侵奪，在地方層面得不到公正合理解決，被迫要遠赴京城上訪，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協助。據《明報》得自國家信訪局的消息指出，近年直接到北京向中央政府部門上訪陳情的民眾數量不斷增加，其中八成以上是有道理的，而八成以上問題其實是可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而在基層解決。國家信訪局長周佔順認為，地方政府沒有提供應有的幫助，是導致上京陳情人數增多的重要原因。

其實，問題不能在地方解決，正因為問題是由地方官員幹部所造成。例如，據參加今年人大會議的代表介紹，重慶市政法機關去年做的一項調查証實，村幹部違法犯罪呈上升趨勢。「村官」腐敗已成為破壞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大根源，由此引發的群眾上訪、舉報佔到總量的70%左右。

因此，越來越多的民眾到北京上訪，北京的「上訪村」竟聚居有10萬信訪者。在04年12月12日聯合國「世界人權日」，上訪者到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不斷，有上訪者跪國旗、衝擊國旗、服毒、自焚、向公眾派發傳單和廣播，天安門分局派出所抓走了四百多人。而報章常有披露，各地方當局除了在當地阻截赴京上訪民眾之外，還派員赴京抓回本地居民。

在構建和諧社會理念提出後，如何應對承載着社會最密集、最尖銳矛盾的「信訪洪峰」，也成為中央高層的注意重點之一。

2005年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新的《信訪條例》（修正草案）。專家指出，新《信訪條例》最大的變化，就是突出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打擊報復信訪人」從十年前舊《信訪條例》中的普通條

款，提升至總則位置。當然，即使是這樣立例，地方官員仍然可以不加理會，依舊騎壓在人民頭上的。

出席全國「兩會」的政協委員向當局發出警告，現在財富迅速向少數人手裏集中，特別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一些強勢群體和少數先富之人，以犧牲百姓和弱勢群體為代價，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如果人民內部矛盾處置不當，局部問題就可能轉化為全局問題，非對抗性矛盾就可能激化為對抗性矛盾。

據公安部統計，2004年上半年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事件，顯示經濟利益矛盾已成為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導火線。在近年愈來愈多的「上訪大軍」中，失地農民和僅得到小量補償的城市拆遷戶佔有很高比例。

官僚架構日益膨大而貪婪

官僚架構日益臃腫，是很不和諧社會的特點之一。儘管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要精簡，但實際上，這個官僚機構却是越來越膨大。

在今年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指出：內地平均26名平民就養活1名官員。權威人士估計，中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目前高達1316萬人；當今吃「皇糧」的總人數已高達4572萬人；據報道，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幹部消費了。（見3月7日《明報》）

「民革中央」在四川省德陽市的調查顯示，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其中，鄉級債務總額接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近五倍。除這些直接負債外，鄉、村兩級組織都有為數不少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包括為所屬企業、單位擔保債務。以此推算，全國鄉、村債務超過一萬億元。

農業部的資料顯示，至去年底，鄉村人口約九億三千萬。鄉村負債相當於每個農民要承擔1075元，等於其年均收入的四成。

財政部科學研究員白景明指出，鄉、村兩級組織的巨額債務已成經濟發展的包袱，不僅令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與發展滯後，一些地方甚至連基本的運轉都不能保證；大量的還本付息，不可避免地擠佔農村建設資金，加重農民負擔，不利於農村的社會穩定。（04年11月30日《蘋果日報》載白新華網）

中國的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中共越說「反」則越多。以下試舉些新事例來證明。

自去年國家審計署掀起「審計風暴」以來，審計這把反腐敗利劍，頻頻出招刺向財政資金的違規和腐敗地帶，已揭開「八大黑洞」。據有關部門透露，去年審計署查出的各類違規資金2,600多億元，較上年增長十倍，已向紀檢司法機關移送各類違法犯罪線索1,100多件。國資管理公司及大型國企更成為腐敗的大黑洞、重災區。據檢察署統計，8成貪官拿公款行賄，貪污受賄4成來自國有企業。

「兩高」2004年打擊犯罪的記錄是：打擊走私、金融詐騙、偷稅漏稅等嚴重經濟犯罪活動，共批准逮捕罪嫌20,425人（同比增6.3%）；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百萬元的有1275件（同比增4.9%）；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縣處級至省部級工作人員2960人；立案偵查借企業改革之機侵吞、挪用、私分國有資產涉嫌犯罪的國有企業人員10407人；立案偵查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索賄受賄、徇私舞弊的行政執法和司法人員9476人。（3月9日《文匯報》）

上述數字只是官方挑揀出來「示眾」的，其他官官相衛、庇護下屬、未被逮捕立案法辦的不知還有多少。在這樣錢權結合、貪污橫行、人民敢怒不敢言的社會，又怎能構建和諧？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反面表現

多年以來，國內許多學者不斷提出必須實行政治制度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剷除官僚貪污腐敗和專制壓迫。溫家寶在《報告》中，規劃今年工作的總體部署之一是：「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制度。」

不過，在同一《報告》的前面回顧一年來的工作中，他却没有提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件事，反而在以前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發言中，又曾經表示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見本刊04年第3/4期《社會不公更激化官民矛盾》一文所引）。

而在實際上，「胡溫新政」兩年來，政治改革並無表現。儘管推出《黨內監督條例》，並在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中強調「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的理念，試圖解決權力監督、權力運作體系方面的問題，但觸及政治體制的改革卻毫無動靜，反而繼續迫害異議者。例如：胡溫主導下的中宣部又對知識界開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為由，封殺內地日趨活躍的意識形態領域，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悼念趙紫陽的異見人士張林，他在八九民運後被關押至少八年。他今年1月得悉趙紫陽去世後，趕往北京，試圖參加趙的葬禮，但被當局拒絕。他返回蚌

埠時便被公安拘留。

04年12月中旬，繼一度扣留劉曉波、余杰及張祖桦後，內地著名人權分子李柏光亦在福建被當局扣留。他是內地著名記者趙岩的戰友，兩人曾一起協助福建、河北等省份的失地農民，爭取權益。趙岩在04年9月被指涉嫌洩漏國家機密，遭當局扣捕，久未獲釋。

在今年兩會期間，北京大批公安以及「義務」巡邏員，在市內展開連串掃蕩行動，扣留了大批「可能會製造麻煩的人」。近百名公安又突擊北京近郊的「上訪村」，對含冤上訪的老百姓拳打腳踢、見人就抓，合共帶走了逾百人。

《南方都市報》的高層被控入獄，是近年「以言入罪」冤假錯案的又一例。這引起北京及廣州兩地的六百多名新聞從業員，在兩會召開前，以大無畏的精神聯署一封請願信，為《南方都市報》前總經理喻華峯呼冤，指摘廣州當局因不滿該報大膽揭露廣州的黑幕，因而向該報高層報復。他們指喻的人品、能力得到同行認同。而且「主犯」獲釋、「從犯」反被重判的結果，令審訊更顯荒謬。這封請願信，送到主管單位南方報業集團，為喻華峯鳴冤，也為《南都》在過去一年受到廣州地方當局的報復和司法迫害鳴不平。

當局對網上言論的監控愈加收緊，不僅查封了多個網站，包括去年9月查封北京大學「一塌胡塗」等，還拘捕多名網絡人士，控以顛覆國家罪，「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網絡異見者監獄」。

中國當局對網上言論的控制，多管齊下：一、直接查封敢言網站；二、在網上論壇設立嚴格的審查制度，人民網「強國論壇」等官方網站，都設立嚴密的字詞過濾系統，凡涉及國家領導人姓名、敏感事件的言論，都不能自動上網，須先經審核；三、嚴厲打壓網絡異見人士，包括湖北杜導斌被判囚三年、陝西顏均被判囚兩年。

此外，清華大學「水木清華」網站聊天室從3月16日起限制校外用戶登錄，引起清華學生不滿，在校園舉行集會抗議，悼念「已死的水木」。北京報章報道，包括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的網上聊天室近日亦有類似限制。有網站負責人表示，此次收緊限制是根據教育部相關文件執行。

106名中國異見人士上月在互聯網上，發表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公開信，批評中國人權倒退，要求聯合國敦促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因維護公民權利而被拘押的人士。

聯合國接着在公布的報告中，敦促中國加強維

護憲法所保障的人權，並批評北京恣意關押那些和平表達宗教與政治意見的人士。

以上列舉的今天中國政治體制專橫腐敗事例真是俯拾即是，舉不勝舉的。在各級黨政幹部牢牢掌握着無限大的政經特權、人民大眾則完全無權的政治制度中，黨政幹部是絕對不肯把政經大權交回人民，而必然誓死拒絕的。這樣，民主的政治體制又怎能建立起來？！而沒有民主政治體制，則社會必然產生激烈的矛盾衝突，人民在被剝削壓迫之下就勢必起來反抗，爭取自身的權益，如此，又怎能構建起和諧的社會呢？！

朱鎔基在辭去總理職之前，據海外一些網站報道，他曾在前年2月的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脫稿發表了「真情演說」，批評內地社會裡裡外外全都是假，「惟獨只有黨政領導幹部的腐敗，才是貨真價實的。」他指出：中紀委當時完成了一項準高幹調查報告，政治局常委看過後，莫不感到震驚沉痛，直言：「這樣的局面繼續下去，哪有政局不亂、百姓不反道理……。」據報，中紀委書記尉建行在會上公布的高幹黨風調查，披露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壞的和最壞的比例高達六成。（詳見04年12月10日《蘋果日報》轉載）

上引的報道雖至今未得到官方証實，但恰恰在該報道披露4天之後，《文匯報》也刊出了《瞭望東方週刊》13日消息：中紀委、中組部巡視組組長任克禮，在完成了對全國3分之2的省、區、市省級領導幹部的巡視工作後對該週刊的專訪中表示：

「現在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就是幹部的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兩個大問題，因為現在這些已不是個別現象。」這幾乎等於証實了朱鎔基所批評的腐敗和「裡裡外外都是假」確是普遍存在的。

難怪溫家寶在上月中的國務院第3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承認：「導致腐敗的深層次原因未能根本消除，反腐倡廉的任務還很艱巨。」（2月28日《明報專訊》）這是承認反腐倡廉工作很難完成的官式委婉說法。

總括本文列舉的具體情況和分析，可足夠証明中共新領導層現時倡言要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比較江澤民提出的「小康社會」將更為遙遠無期，除非中國真的實行了徹底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共的官僚專制及其錯誤的方針、政策。否則，官方的宣佈，便只能是像古語所說的「畫餅充飢」、「緣木求魚」、「空中樓閣」而已。

2005年4月10日

中國今日的婦女

——與中國女工網絡積極份子的訪談

兆立譯

〔訪問者路絲 (stephanie luce) 的前言：毫無疑問，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增長。我們在美國所看見的，特別是在貿易方面（從中國來的進口貨）及在外國直接投資上（美國資本之投向中國），都有了顯著的增加。這些趨向在1990年代中及末期已經開始。但是，自從美國國會在2000年給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以及自從中國在2001年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這些趨向却有了極大增長。中國現在在世界上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接受外國投資最多的國家。

雖然，許多美國公司（及其他跨國公司）熱切地指望龐大中國市場及中國工人極低廉工資，但是美國勞工運動卻注重於停止將美國的生產及工作機會流向中國。

2004年春，美國的勞聯產聯（AFL-CIO）向美國貿易代表提出請願書，指責中國享有不公平貿易優惠，這是美國貿易法不能容許的。

勞聯產聯特別地主張：由於中國有系統地壓制工人權利，〔美國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運用1974年美國貿易法第301(d)條來改正中國在貿易上所享有的不公平優惠。雖然，第301(d)條在過去曾被用來對違反有關知識產權及傾銷方面的貿易條例提出反對，它卻從來沒有被用來針對人權之被違反而提出各種要求。

勞聯產聯的請願書提出這樣的論點：由於中國堅持不懈地否定工人的結社自由，鼓勵強迫勞動，而且不強制執行它自己的工資、工時及工作安全的法律，中國在與美國公司競爭時享有成本方面的優惠。請願書要求美國貿易代表和美國總統強加貿易補救方法，或者對中國制裁，以補償中國在成本上所佔的優惠。

有些批評家爭辯說，雖然美國公司真的為了享受中國的低工資而將工作機會搬到中國去，勞聯產聯的做法是對樹立工人權力有害的。例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勞工中心的王肯德（譯音）在勞工論壇上寫道，勞聯產聯的運動在幾個方面是被錯誤引導、會導致錯誤結論的，抗拒跨國公司較正確的方法是發展美國工人運動與中國工人運動之間的聯繫。

至於與中國官方工人運動能夠建立多大的聯繫，勞工運動積極份子中間是有爭論的。

在一方面，中華全國總工會是該國唯一工會，其實是中國政府的一部份。工人不可以組織獨立工會，而企圖在國有企業中組織獨立工會的人定會遭到嚴厲壓制。在另一方面，全國總工會有1億2千5百萬會員，是世界上最大工會，而且——有人說——其內部並不是磐石一塊的。

有人建議：在全國總工會中，也許有活動的空間，或者至少在某些地點，也許有與它一起工作的可能。特別是在外資企業中，由於未被國家所控制的工會依據傳統進行組織，所以似乎有空間可以獨立地進行組織。例如紐約時報報道，全國總工會曾向沃爾瑪（Wal-Mart）等外資公司提出威脅：如果它們不讓工會在其工廠設立分會，它就要控告它們並把它們列上“黑名單”。

不管在全國總工會內部有沒有改革的潛力，美國一些工會份子已開始尋找機會與中國工人合作。2004年3月，八位勞工教育家和工會領導人訪問了中國的勞工學者、工會領導和普通工人。2004年夏，幾個美國工會積極份子和美國工會，包括SEIU、CWA和Jobs with Justice，資助了二位從中國女工網絡來的婦女到美國來參觀。中國女工網絡成立於1996年，是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從外地來的工廠女工的一個草根組織。

這兩位婦女，彭燕〔譯音Pun Ngai〕和楊麗明〔譯音Yang Lie Ming〕，在美國各地游歷了一個多月，訪問積極份子，並與他們共享在中國組織工人的經驗。以下的文字記錄是根據他們於2004年9月9日在麻薩諸塞大學Amherst分校勞工中心所作的一次談話。

彭燕是中國女工網絡創辦人 and 會長。她也是香港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而且是（即將於2005年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Made in China: Subject, Power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一書的作者。

楊麗明是一位從外地來的工人。她在深圳經濟特區的一個工廠中做過工，四年前成為中國女工網絡一位全職組織者。

楊麗明：我在工廠裡做了三年工，然後為這個團體當一位全職組織者已做了四年。我很想、也很高興與大家共享從工作中得到的故事。我離開中國以前，到醫院去探望了一位工人。他在一間替沃爾

瑪生產商品的工廠中工作。有一天，他從很高的地方跌下，跌傷了他的頭。

彭燕：我是中國女工網絡的創辦人。但是我現在是做一位志願者。我們香港有三個組織者，在大陸有十個組織者。大陸上的組織者原先都是在工廠中做工的工人，然後替這個中心當組織者。

我們的中心的基地是在南中國，是在經濟特區。經濟特區是1980年代中國向國外資本開放的時候設立的。到了1990年代，中國就向世界各地的店鋪開放——各種各樣的工廠〔為它們製造商品〕。現在你在中國南方可以看到Reebok, Nike, 各種各樣的公司。

所有這些公司都要靠分包，那就是說，把工作分包給韓國資本、台灣資本或香港資本所經營的公司（或稱工廠）。這些工廠就從農村招募工人。

所有這些工人都是從外地來的。他們沒有充份權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有一個以你的出生地為根據的戶口制。如果你在鄉下出生，那個鄉下就是你被允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就沒有權利搬到城裡去，在城裡工作。

但是當中國開放給國外資本，他們需要鄉下來的工人，作為廉價勞工。在鄉下出生的工人第一次被允許移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公司所提供的宿舍。這些工人全部都是從外地來的，百分之七十是女人。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從外地來的女工組織起來。

我們不被允許設立獨立工會。中國的工會都是在政府所控制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旗下。但是那個工會對外地來的工人不感興趣。

全國總工會把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的工人組成工會。許多這些企業現在慢慢地被私有化了——變成與外國資本合資的企業。在少數情況，原有工會還是留在那裡，但是一般情況是，在那個時候，這個工會就被踢出去了。那就是說，沒有一個由國家所控制的工會來代表在外國資本所擁有的工廠中工作的工人了。

我們進來，企圖組織那些工人。我們的基本組織模式是社區組織模式。我們不是企圖組織獨立工會。其實我們只是用其他方法來組織工人。楊麗明就要講這個事情。

楊麗明：我們有四個工作焦點：1) 合法的勞工權利；2) 性別覺悟 (gender awareness)；3) 工作安全與健康；4) 另類經濟生活，亦即合作社。

我們在工業區有一個中心——一個可以給我們舉行種種活動的地方。大多數女工都是年青人，16到25歲。她們惦念家及家鄉，所以我們建立工人中心作為她們的家。

她們到工人中心來與大家相見，共享她們的故事。但是許多女工不能到中心來——她們的工作時

間很長，不到晚上十點不能下班。所以我們必須要到她們那裡去；到她們的宿舍去看望她們。

我們試圖建立小組。我們先要從她們之中找到一個領頭的人，然後訓練更多領頭的人，使她們有寬廣的看法，然後教她們如何建立她們自己的網絡。

我們是跟工人們談談她們的切身利益——她們日常的需要。她們需要熱水、她們需要風扇——這些是她們的基本需要。我們圍繞着熱水問題做了很多組織工作：女工們要喝熱水，要用熱水洗衣服。如果她們的宿舍裡沒有熱水，她們有的要走8層樓梯到樓下去拿水，再提到樓上來。

電話是另一個常有的基本問題，因為這些婦女要打電話給家人。所以我們圍繞這些基本要求把她們團聚在一起。我們教她們如何寫信給經理，如何寫請願書。當女工們提出要求而得到勝利的時候，她們就會覺得得到了一些權力。

經過一、兩年以後，我們把她們的要求提高到爭取加班費、爭取最低工資等等的問題上。事實上中國的勞動法訂得很不錯，所以我們與這些女工合作，要使僱主遵守法律。

例如，我們圍繞一個要求叫大家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我們也許得到一、兩千個簽名。這是很可能做到的，因為宿舍中一個房間就有10至12個人住。我們會把請願書寄給經理，或者寄到別的地方：寄到工會或者政府的勞工局。勞工局一接到這個請願書，就會來調查，會找經理部門談判。

彭燕：我們在這些案例上做得相當成功。這是因為中國的勞動法相當好，而且觸犯法律之處太明顯了。就是因為違反法律的事例太明顯了，百分之九十的事例是我們打贏的。

我們這一次到美國來，參觀了許多勞工中心，遇見了許多積極份子。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也打過這樣的官司，但是通常只有百分之五十打贏的。我們的困難，主要是要工人們了解她們的權利，然後是願意鬥下去。

楊麗明：我們現在已經組成了16個宿舍網絡，有的很小，只有15至20個工人，但是有的有100個工人。

除了工人中心與宿舍網絡以外，我們還有活動麵包車。我們把麵包車開到工廠區，在工人們的晚餐休息時或下班回家後與他們談心。麵包車從下午五時工作到晚上十時半。

我們開流動麵包車去跟工人談心的中心目的是就下列問題來訓練她們：如何在工作場所防止性騷擾、安全與健康問題、受傷之後怎麼辦、懷孕以後怎麼辦。我們一個晚上可以跟200至300個工人談話。麵包車上還有大屏幕電視機，立體音響設備和小型圖書館。

工傷補償

我們也運用麵包車來向受傷工人進行組織工作。我們把麵包車開到醫院去，與受傷工人見面。在工作中受傷是常有的，特別是對睡眠不足或受很大壓力的工人。

工人每天工作12至16小時。還有，很多從南韓或香港買來的機器很舊了，所以工傷的機會增加了。

我們在醫院中發展我們的網絡，幫忙受傷工人得到補償金。申請補償金的程序非常複雜，有很多手續。如果一個工人有保險，那末他的申請獲准的話，可以得到美金2千元的補償金。如果這個工人沒有保險，你可以幫他告到法庭去。通常也會告成功，拿到補償金。不過要花很久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錢聘請許多全職組織者，我們重重地依靠義務工作人員，有些受傷工人靠義工幫忙。義工們辦了自己的業務通訊，一來介紹怎樣在受傷工人之間進行工作，二來指示受傷工人怎樣爭取工傷補償金。

我們的工作的最後部份是我們的合作社。這是與工人宿舍與醫院有連繫的消費品合作社。當工人因英勇鬥爭被解僱以後，我們可以介紹她到合作社去工作。受傷過的工人因為太多了，我們無法叫她們全部在合作社工作，只能收少數人。

彭燕：我們所使用的是社區組織模式，但是我們也逐漸轉到以工廠為單位的模式。

我們認為，以發動反對某商品商標的運動，我們可以在（生產該商品的）工廠平面上進行工作。許多大公司有他們自己的公司行為準則。我們可以插手進去，建立一個工人委員會專門監視公司在遵守其行為準則方面做得如何。我們也可以運用這個工人委員會來監視公司遵守國家勞動法的程度。

我們不主張抵制某商品。我們只試圖與反血汗工廠（指勞動條件差、工資低、工作時間長的工廠）的團體、與我們的委員會一起工作來改進工作條件。

為提高工資而鬥爭

我們時常聽到經營工廠的分包公司的埋怨，說賺錢不夠。在過去十年中，工廠老板是看到價格在下跌。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仍然賺許多錢。

我們知道、有錢就有系統。有的人說大部份利潤落到零售商手中，有的人說大部份利潤進了工廠老板的腰包。對我們來說，不管錢到那裡去，我們只要求提高工資。

如果這個名牌商品公司或零售公司有公司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們就應該提供為使這個準則得以實施所需要的資源。那也許意味着提供更多的錢給製

造該商品的工廠老板。工廠老板必須從零售公司那裡拿到更多的錢使他們能夠遵守行為準則、付出較高工資。

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中國政府允許我們組織起來對付外國資本。我們不可以組織起來反對國有企業，但是我們可以在外國資本所擁有的工場中進行組織。有時候僱主會報復，有時候地方政府會報復。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中，我們被看成為社會工作者，不是敵對勢力。

〔問題：你可不可以多談點工廠中的工作條件？〕

楊麗明：至於工作條件，首先，工資是非常低的。我們做12小時的工只拿到折合美金2元。中國有最低工資法，大約每月60美元。但是你通常要加班才可達到最低工資的標準。

我們沒有病假。我們在主要節日有放假——舊歷年我們有5至7天的假期。這個假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我們唯一機會可以回到鄉下去看望家人。除此以外，我們很少有休假時間——有的人每月只有一、兩天。

〔問題：工人會不會怕組織了以後僱主把工廠搬到別地方去？〕

楊麗明：僱主的確時常向我們威脅：如果你們組織起來要求提高工資，就會搬到別地方去。但是這種事情已經在工廠發生。僱主已經把深圳的工廠關掉，搬到中國新開的區域去。但這裡的工人本來是從外地來的。我們可以跟着工廠走。

〔問題：你們跟官方工會合作嗎？〕

彭燕：我們必須與官方工會合作。我們在流動麵包車上工作，我們就要與醫院工會合作。我們在大學裡活動，我們就要與大學裡的工會合作。這些都是全國總工會屬下的工會。

〔問題：女工離開工廠以後做什麼事呢？她們拿到工資後怎樣處理？〕

彭燕：許多人寄錢回家去。事實上，你可以在家鄉看到很多新蓋房子，因為人們用這錢蓋房子。蓋了房子以後，這錢就用來作為孩子的教育費。

不過，近二十年來，我們看到有些女工變得較獨立了。十年前，她們寄百分之八十的工資回家。現在她們只寄一羊。她們留較多錢給自己用，買些小東西。女工通常到了25歲左右就被迫離開工廠。大多數人回到鄉下結婚了。如果她們跟城裡出生的人結婚，她們就可以留在城裡，但是大多數城市男人不願要鄉下女人，所以大約95%的女工回到鄉下。她們結婚以後怎麼生活，就要看她們嫁給誰。如果丈夫很窮，她們可能會回到城裡來，企圖找工廠的工作。

〔兆立譯自《逆流前進》雙月刊2004年11/12月號〕

向遭受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人民民主陣線 威脅的菲律賓左派伸出國際援手

——第四國際的呼籲——

獨立的、進步的、革命的左派所有成員，今日都處在菲律賓共產黨及其軍事助手新人民軍的武力威脅之下。面對着這樣一個在過去幾年中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情勢，一個重要的國際團結一致的運動，在2005年1月的第五次世界社會論壇上產生了。

第四國際要求把這個運動進一步擴展。當為數不少的積極份子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我們不能坐視不加援手，菲律賓大眾力量的前途極為危險，而恰恰是構成我們共同鬥爭基礎的原則也處在危急關頭。

數十位積極份子已被殺死；還有數以百計的積極份子知道，他們在任何時候會變成新人民軍的目標。所有主要的、進步的、革命的政黨，還沒有受到菲共控制的，都已經受到影響（包括棉蘭老島革命工人黨、第四國際菲律賓支部在內），或者現在正明確地受到威脅。

在群眾組織中，特別是在農民組織中領頭的積極份子，已被暗殺。在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鬥爭中、爭取取消第三世界債務的以及在反戰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已被挑出來指責為“反革命份子”和“帝國主義特務”。近年的經驗證明，緊接着這些指控，他們就會被菲共所私設的法庭——所謂“人民法庭”——，依據其領導層的命令，宣告有罪。

由於這種對付左派積極份子的暗殺政策，菲律賓共產黨事實上正在替菲律賓軍隊和警察的特務進行挑撥離間和機動，創立有利的條件。這種做法使人民力量分裂和癱瘓，使他們更難進行他們的鬥爭。它極度地使我們為之而奮鬥的革命計劃和社會主義出路失去人民的信任。因此，它等於幫了帝國主義和右派的大忙。

菲共不能容忍多元的人民運動和政治左派在菲律賓的發展。它試圖，如果必要時用武力，強加它自己的獨霸。我們必須在國際上竭盡所能對這個多元左派加以支持和保護，對它的生存權利加以維護。我們的責任是清晰的。

菲共正在違反我們為另一個世界而戰鬥的各個最基本原則——這另一個世界是一個基於團結、平等和自由的社會主義世界。我們決不能容忍工人和人民運動內部的暴力行為。我們決不能接受一個自稱為革命的政黨將它的武裝力量轉向進步的積極份子組織。這是完全違反我們所主張的一切事物的。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

2005年3月

〔北立譯自《國際觀點》2005年
3月號總365期〕

以奪取政權改變世界

——在歐洲社會論壇上的爭論

赫爾斯

〔以下是作者在2004年10月16日的歐洲社會論壇上就“進行社會轉變的戰略”這個問題的爭論所發表演說的文字記錄。〕

（墨西哥薩巴達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副指揮官馬科斯在1990年代的一次宣告中觸到了這個爭論的核心。他宣佈，在原則上，薩巴達主義者拒絕為取得國家權力而戰鬥。我不要對馬科斯作太大的抨擊，因為依我的意見，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的真正開始，是1994年1月1日的薩巴達起義。但是馬科斯及與他思想相同的人們不去對付國家權力這個問題，反而認為只要對國家掉頭不顧就有可能實現反資本主義的社會轉變。他們的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這可以從現代幾個緊要的社會鬥爭中看出。第一，阿根廷。依我的意見，在過去四年中，阿根廷的社會、政治鬥爭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鋒的。當阿根廷的經濟、因“其貨幣與美元掛鉤”和推行極端新自由主義政策等的直接結果，在2001年12月崩潰的時候，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中等階級的儲蓄金和生計被剝奪了。這就導致龐大的社會爆炸。

因此，一個巨大的自我組織過程展開了，包括街坊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的形成，工廠的佔領並使其在工人自我管理下繼續生產，失業者抗議運動的形成以及許多其他形式的鬥爭。巨大規模的自我組織，同時，所有的資本主義政黨及其領導者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但是今天，這個運動在那裡？它大部份已經消失或者甚至被籠絡過去做工資極低的政府工程了。

克萊恩（Naomi Klein）寫了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說群眾運動的衰落是因為極左派組織的宗派主義。她聲稱，他們把他們之間關於不同思想的爭論和為瑣事的爭吵帶到運動中來，因此，群眾不但厭倦了，而且覺得灰心喪氣，就走掉了。

我並不低估這樣的可能性，即她對這些組織的

批評帶有真理的成份，但是，那不是基本的問題。基本的問題在於，沒有大的反資本主義政黨，能夠以一個全面的、以取得政權為目的的方案，將這些運動這些組織團結起來。這就是我對阿根廷左派各團體的批評——那就是，在過去三十年中，它們有著比大多數國家更多更好的機會，但是縱然有那麼多那麼好的機會，它們卻無法在團結的基礎上，創立這樣一個政黨。

阿根廷運動的衰落是一個巨大悲劇，因為有一段時期，在那個國家裡，高層束手無策，所以用反資本主義的道路來解脫危機極有可能。現在，我們只有資本主義的正常化和腐敗的右翼的底隆主義者的回朝。如James Petras 所說的一樣，“人民起義的原先強處——它的自發性、群眾性和自主性——變成了它的關鍵弱點，那就是：缺乏一個全國性領導層，能夠把各種不同的力量，在一個一致的、以取得國家權力為目的的綱領背後團結起來。”（全文登在www.rebellion.com網址）。

同樣問題，在委內瑞拉不同的環境中，被提了出來。2003年某一日，倫敦《觀察家》報登載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報導克拉克斯市郊外各集居區的廣大群眾的自我組織。這個記者向我們報告人民群眾怎樣接收學校和像水、電那樣的公共企業，怎樣發動掃除文盲運動等等。一位積極份子告訴記者，“我們不要像查韋斯政府那樣的政府來代表我們，我們要自己組織政府”。這篇文章也告訴我們，集居區的有些積極份子對玻利瓦爾圈子裡的人有些仇視，指責他們把政治拖進鬥爭之中。

我對這些反政府、反國家的情緒，表示同情，但是最後分析起來，這些感情是一條死路，一個陷阱。為什麼委內瑞拉現在有這麼巨大的玻利瓦爾過程、這麼高水平的反對右翼、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選出了一個左派政府。支持掃除文盲運動、支持增加養老金和工資、支持兒童免費早餐計劃的一切資源從那里來呢？當然是從政府那裡來的。

如果你說我們必須拋棄這個國家這個政權，那末查韋斯是否在右翼的公民投票中被打敗，就變得無關重要了，因為所有一切是國家的事，與我們無關。

實在說來，如果查韋斯在8月23日的公投中被打敗的話，那就會是玻利瓦爾革命過程的巨大失敗——事實上，它就會在反動的狂歡中結束了。廣大數目的工人階級和窮人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不要背棄查韋斯，不要背棄他們的革命。他們以數以百萬計的人數從集居區出來投票支持查韋斯，在政治上對歇斯底里的資產階級、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和美國帝國主義給以極大的打擊。

我現在並不是說查韋斯這位左翼平民主義者是委內瑞拉社會主義轉變的最後結果。我只說我們保衛他反對右翼。但是，要進展到玻利瓦爾革命的勝利，委國群眾需要創立由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的全國行政系統。那並不是拋棄國家，而是創立一個不同形式的國家、一個不同形式的政權。

你可以在墨西哥看到同樣的事情。薩巴達主義者已經在奇阿柏斯的高地村落裡開闢了他們自己的自我組織空間，在2003年9月正式宣佈了他們自己的獨立市政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但是這是各種非常特殊情況的產物，包括地理上的孤立和受到整個墨西哥平民社會的保衛的事實。在這個時刻，對墨西哥資產階級而言，對他們發動全面攻擊，在政治上是太危險了。在將來，這個情況能夠容易地改變。

然而，自治還沒有解決薩巴達基地社區的各種問題。它們是貧窮的社區。那裡的人民，與墨西哥許多其他地方的窮人一樣，同樣有健康、營養和生活水準等方面的問題。薩巴達運動只提出了一些不能單獨由他們自己社區或者由奇阿帕斯整個區域來解決的問題。要幫助奇阿帕斯的原住民脫離貧窮，你（至少需要）在整個墨西哥進行社會轉變。

我就要向霍洛威（John Holloway）問一個問題。薩巴達主義者已經憑藉他們自己的起義，創立了一個解放區。假定同樣事情在整個墨西哥各地發生的話——那就是群眾起義了，取得了他們自己的工廠和社區的控制權。那末，這些自我組織的社區——譬如在Veracruz、墨西哥市、Monterrey、Guadaluajara等地的自我組織的社會——應不應該彼此之間進行會議？應不應該大家一起討論將來怎麼辦？應不應該根據一個全墨西哥社會發展的計劃來

協調各地的經濟計劃？應不應該對一個全墨大會選出可被罷免的代表來決定這些事務？對於從國內、外的一定會發生的巨大反革命浪潮，他們應不應該協調他們的對策？

當然，他們應該。假如他們不去更換墨西哥資本主義國家，只是對它置之不理的話——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卻不會對他們置之不理。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創立他們自己的全國性、自我管理的協調，那末，他們將會創立墨西哥全部戰鬥左派的以下口號所說的東西——工人、農民、原住民和普通公民的政府。不但是那一點：他們將會創立一個另類權力形式，一個另類國家形式。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公社國家”（Commune State）。

霍洛威拒絕接受這兩個另類國家形式和另類政黨形式。依我之見，拒絕組成左派的政黨、拒絕為任何另類國家權力形式而戰鬥，都是不好的選擇，都會造成災難的。

今天，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政治代表有巨大的危機。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黨向右轉所造成的。這就威脅着工人階級在全國政治舞台上的存在。這非但不是件好事情，而且對全國性政治交談，對鬥爭、對群眾運動都有不好的影響，要了解這一點，你就要看看蘇格蘭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蘇社黨）的好榜樣。

現在蘇社黨在蘇格蘭議會中有六個議員，而且擁有相當的選民基礎（將近10%的選票）。這是件壞事情，是個偏離嗎？當然不是。事實上，蘇社黨的議員總是參加工廠門外的罷工糾察隊，曾經領導過反對種族主義移民法、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運動而經常因參加Fas lane核子潛水艇基地門外的抗議隊伍而被逮捕。所以他們是在各種鬥爭中的一個積極因子，不是與它對立的因子。

同樣地，意大利的重建共產黨、西班牙的聯合左派，至少就目前而論，都是鬥爭中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子。我同意格蘭姆西（Antonio Gramsci）的話：政黨是“現代王子”。社會鬥爭總是努力尋找一個政治代表，而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置之不理。這句話在今天的意義就是，我們不要試圖尋找一個可以躲在其中逃避國家干涉的、大多是神話似的自治空間，而要建立以反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左派聯合政黨，把鬥爭往前推進。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但是，沒有革命就建立不起來。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2004年12月號總第362期〕

美國：反戰鬥爭正在繼續

美國《退伍軍人報》社評

〔以下是（美國）越戰退伍軍人全國反戰協會（VVAW）所出版的《退伍軍人報》2004年秋季號社評的譯文〕

四年一度的選舉現已結束，布殊政權已再被給以四年來實行〔它的公開反民主親帝國主義的政策。人們期望看到我們VVAW對這個局面有什麼反應。但是，對任何知道我們的歷史的人們，應該不會感到有什麼意外的。〕

VVAW是1967年在約翰遜民主黨政府期間在“我們的”戰爭〔即越戰——譯者註〕中成立的。自從那時開始，我們一直為了和平、社會正義和使每個時代的退伍軍人都有較好的待遇而繼續鬥爭。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沒有一個政黨我們會輕易放過。共和黨得勝〔組織政府〕不會使我們喪失士氣，民主黨得勝也不會使我們疏於防衛、失去警覺。

我們在尼克松執政的年代與他的反動力量苦鬥。我們在每個繼任政府的統治下繼續鬥爭，不管他們對我們作怎樣的攻擊。我們成功地幫助結束了越南戰爭，讓世界人民知道橙劑（Agent Orange）這種化學毒物武器對人類健康的禍害等事實，決不能夠被否認的。VVAW在所有這些鬥爭中都是站在前鋒，不像〔幫助布殊競選的〕所謂“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退伍軍人組織根本沒有替退伍軍人做過什麼事情。不要忘了，尼克松雖然在1972年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但是不到兩年就退位了。

隨著每次新的戰爭，VVAW就有了新生代的退伍軍人參加進去。他們都是為了要結束產生戰爭的那種非正義而參加的。我們已經自覺地做出決定，要堅持到底，繼續為你們而奮鬥。所以，我們積極支持新成立的反伊拉克戰爭退伍軍人組織（IVAW）。

我們在VVAW中的人們永遠採取長遠的觀點。我們瞭解，為和平、為真正社會正義的鬥爭決不會隨這個或那個政黨的下台而結束。

你只要讀一讀Howard Zinn所寫的《美國人民的歷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你就會看到，從〔1776年立國時的〕革命戰爭到現在，每個時代的退伍軍人和現役軍人都是站在鬥爭的前鋒的。這是我們的傳統，政治家們，不管是屬於那一政黨，不管是佔有什麼職位，應該知道我們決不會消失的。

選舉的結束，是這個繼續不斷的鬥爭下一階段的開始。參加我們吧！

從東京灣事件到極大殺傷力武器 謊言，週年紀念日，更多的謊言！

喬·米勒

“謊言就是謊言。它是隱瞞事實的敘述。”——引自富布賴特參議員在其《Hearst's arrd Minds》（1974年）一書中對約翰遜總統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正式文告的評語。

今年夏天有很多週年紀念日：D-Day（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法國北部開始進攻日）的60週年，Goodman, Chaney和Schwerner等五人去世的40週年，Woodstock（真正的）〔伍德斯多克音樂節〕的35週年 and Tricky Dick〔詭計多端的尼克松總統〕辭職的30週年。哎呀！當我們覺得好玩時，時間就飛馳過去了！

對參加過越戰的我們而言，也許更重要的是，今年8月也是東京灣“事件”的40週年。國會所幾乎一致通過的這個東京灣決議案，造成了將近三百萬的我們被送上戰場。而這個戰爭卻造成了將近6萬美國人的死亡和數以百萬計的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人民的死亡。

作為〔越戰的〕一個參與者和知道東京灣謊言背後的真理的人，40年以來，以下的問題仍在每年8月頭5天的安靜時刻裡湧上心頭：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的〕黑花崗石牆上將近6萬個名字中有幾個人可能根本不會去越南〔送死〕的？如果知道戰爭起源背後真理的人們早一點大聲說出〔這個真理〕的話，在數以百萬計的死難的印度支那人民中，有多少人也許現在還活的？有多少個肉體上——也在心靈上——殘廢的人現在也許還完好的？我們早一點做的話，會不會真的有好效果的，但是那並不能使這些問題不再被人提出。

真正地說來，到了1968年初，由於富布賴特調查東京灣“事件”的聽証會，在這事件背

後的真理大多已為世人所知。可是，這有點遲了，人民對戰爭的支持正在快速地消退。不過，即使是在那個時候，人們還以國家榮譽為重。我們在戰場上的孩子們仍須得到〔我們〕盲目的支持（而且被新臉孔和新肉體所接替）。到了1971年，東京灣決議案被撤銷了，但是戰爭仍在繼續。對已經倒下的人們承擔義務的這種惰性還在起作用，一直到1975年，越南人民終於得勝為止。

隨著東京灣“事件”40週年紀念日的日益接近，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那些謊言——把我們之中許多人拉進十年多的死亡、破壞和混亂的暴行的那些謊言——背後的真確事實。當我們現在正在討論那些在2003年3月把我們拖進伊拉克戰爭的謊言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當時使用那些把我們騙去打越戰的謊言是多麼容易。

現在美國正在伊拉克進行另一場陷入泥潭似的戰爭，這個特別的週年紀念日應該對我們大家都很重要，包括那些在越南（及自那以後的各個戰爭）中失去了親人的家庭、數以萬計的在國內外與退伍軍人和現役大兵一起參加結束這個大屠宰的人們。一年前把我們拖進伊拉克的明顯的謊言是與把我們拖進越南的謊言，如出一轍。我們必須再次在當時所用的以下的旗幟下面團結一致：“支持我們的軍隊！馬上把他們全都撤回來！”

（譯自美國《退伍軍人報》2004年春季號）

新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

評論人：斯密斯 兆立譯

書名：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作者：Joseph Stiglitz

〔全球化和它令人不滿的地方〕

出版社：(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2)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以下簡稱斯氏) 是主流經濟學各大期刊上多篇具開創性的論文的作者。他曾擔任〔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內閣閣員、總統的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世界銀行的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師。他得過諾貝爾獎。當一位斯氏的聲望的經濟學家用以下的言語來宣佈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在許多方面對全球經濟的了解比精英決策者更深刻的時候，這種發展就應該令人注目了：“今天的全球化對世界上大多數窮人是沒有用的。它對環境的保護有許多地方也是沒有用的。它對全球經濟的穩定也是沒有用的。”（該書第214頁）

並不令人驚奇的是，在各進步的出版物上，對斯氏的這本書的評論，大多數是相當熱情的。可是，理解他的看法的有限，是與讚賞他的批判的有力量一樣重要的。

斯氏的論點可以分為三類。他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骨架中一系列深刻的缺陷。他提供了大量從經驗得來的事例，來說明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實踐中的失敗。他也企圖解釋，儘管新自由主義議程有相當明顯的缺點，它為什麼繼續被推行。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是基於這樣的教條信念：無論什麼時候市場被允許毫無干擾地運轉，它就自動導致最佳效果。政府對企業的擁有，對貿易、投資的限制，都被認為是破壞市場的這種卓越性質的外來阻礙力的典型例子。接下來在政策上的含意就是：公共所有的國家企業必須被私有化，貿易上的障礙必須被移除，資本市場的管制必須被解除，政府支出必須被嚴格控制等等。所有這些轉變必須趕快實行。

相比之下，斯氏則堅持主張，市場會合適地運轉，如果而且只要一組適當的幕後機構早已到位。缺乏合適的力促競爭的法律，私有化將會引致傷害消費者利益的寡頭賣主壟斷和專賣。如果合適的安全網和創造工作的方案沒有被建立起來，那末必然隨着保護主義貿易屏障的拆除而來的失業現象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苦難。雖然富裕經濟可以經得起資本洶湧而進洶湧而出的情勢，這些洶湧却會嚴重破

壞較小的發展中經濟。當經濟下降趨勢發生的時候，它的持續期間和傷害性不能被減至最小，除非國家能夠以增加支出來刺激經濟的發展。斯氏的另類理論在政策上的主要含意，就是需要排好政策推行的次序。私有化應該只有在在一組有效的反托拉斯法律到位以後才實行。貿易的開放應該只有在一個解決自由貿易的社會成本這個問題的機構設立以後才開始。而對資本的控制，應該只有在在一國的經濟達到預期效果所需的足夠數量之後才被撤銷。

依照斯氏的看法，憑經驗得來的證據顯然支持了他的遠景。他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之干預東亞、東歐在1990年代後期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提供了全面的報告。IMF在這些地區過早地鼓勵解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這種過早地解除管制時常導致投機資本洶湧進入已經過熱的股票、房地產市場。當幾乎不可避免的市場暴跌和資本洶湧外逃終於發生的時候，IMF就強加了緊縮方案（從該書第98頁開始）。政府被迫限制信用貸款和限制支出，不顧經濟下降正是放寬借貸、增加政府支出的時候這個事實。

為了恐懼貨幣貶值會提高輸入品的價格、導致通貨膨脹，IMF也向這些受困擾的經濟提供資金以幫助它們維持既定匯率。正如斯氏所注意到的，這些資金事實上却在幫助國際投資者脫離困境同時，讓當地精英有機會大規模撤離資本以保護他們自己的金融資產（第95頁）。可是沒有多久匯率還是貶值了。日後償還這些IMF借款的担子就由受益最少的群體——男女工人們——去挑起。

最後一點，私有化計劃在俄國等國家猛烈地推行，不顧只有當地匪徒資本家 (gangster capitalists) 才有錢購買私有化了的資產這個事實，不顧繼續不斷的經濟放慢使這些匪徒能夠非常便宜地購買到私有化了的企業和自然資源這個事實。

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從理論和歷史經驗的觀點來看明顯是如此不合適的時候，為什麼高層向這些政策提供資金（而且在今天只作少許修改繼續被提供資金呢）？斯氏的解釋主要是求助於意識形態的

壓倒力量。“華盛頓一致意見”的辯護者們是如此信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條，以致確實無法想出任何另類意見或者接受任何負面証據。他們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規誡應用到任何及所有的情況中也許會是不恰當的，不管它們過去的成功記錄是多麼稀少。

可是斯氏也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許多前任的IMF和美國財政部的官員。這些離職官員已在那些曾從他們過去所推行的政策中得極大利益的金融公司中取得薪俸無理之高的職位。他的含意是，以為政府和華爾街之間這扇“旋轉門”對政策的製定絕對沒有影響，就是最天真的想法。據筆者所知，沒有一位“內幕人士”比他更接近於承認馬克思說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這句名言是有道理的。斯氏把馬克思這句名言擴大到包括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那樣的國際性機構：“它〔指IMF等機構——譯者註〕的主要人員中有許多人來自金融界，它的主要人員中有許多人忠誠地服務了多年以後離開它到金融界擔任高薪職位。費雪（Stan Fischer）這位曾在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幾個事例中扮演這樣一個角色的IMF副總裁，就直接從IMF來到花旗集團這個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巨大金融公司擔任一位副董事長。花旗集團的現任董事長（執行委員會主席）是魯賓（Robert Rubin）。他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時曾在製定IMF的政策方面扮演過中心角色。人們不禁要發問：‘費雪之獲得高薪職位是不是因為他曾忠誠地執行過上面交下的任務？’”（第208頁）

斯氏的分析反映了維布倫（Theodore Veblen）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的觀點。在維布倫對他的時代的資本主義的記述中，意義最重大的社會分野是在生產者（工業企業家和他們所雇用的工人），與金融投機商之間的分野。前者的行動注重長期技術進展；而後者則主要關心從金融資產的交易中所得到的短期利潤。金融商的權力和聲望越大於生產者的權力和聲望，社會就越難推動對社會進展所必需的固定資本作出長期投資。簡單地說來，維布倫的中心論點就是：從金融資本的觀點看來是合理的東西與從整個社會的觀點看來是合理的東西，這兩者之間能夠存在緊張的狀態。為了保證金融資本的運轉嚴格地服從工業的發展，必須開始進行體制的改革。

斯氏用同樣的觀點來指出美國財政部和IMF所追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在對全球經濟總的社會合理性不利的情況下推進了金融資本的利益：

“貿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幾乎必定招致工作的喪失和失業的增加——以損害工人的利益為代價。

金融市場在沒有恰當的調節結構的情況下之自由，幾乎必定造成經濟不穩定——而且會導致較高而不是較低的利率，因而使貧農更難買到較廉價的種子和肥料來幫助他們脫貧。私有化，但是沒有同時進行促進競爭的政策，而且不同時保證專買權不被濫用，就能導致較高而不是較低的消費品價格。盲目追求政府預算的緊縮，如果時機不對，就會導致高失業和社會契約的撕碎。”（第84頁）

因此，必須開始進行體制的改革來限制金融的活動範圍。

他的建議包括：

- 當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停止債務的償還，讓原本是健康的公司有機會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第130頁）。

- 當異常的宏觀經濟混亂爆發的時候，頒佈特別的破產條例，向管理層提供重建處境困難的公司的機會（第130頁）。

- IMF在設計脫離困境的方案時，應該再三考慮是否貸出以十億美元計的巨款。

- 改善銀行業務的規則，包括譬如限制投機性的房地產貸款。

- 使用短期資本控制和“資金流出稅”來保護國家免受“投機商的蹂躪”（第211頁）。

- 讓窮地區的國家在IMF中得到較多席位。

- 在IMF、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中應該有更多公開討論。

- 縮小IMF處理危機的範圍，讓其他機構譬如世界銀行來設計發展和過渡的政策。

- 發達國家應該和國際金融機構一起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借款，以幫助後者購買防止國際資本市場暴漲暴落的保險。

- 實行能使債務減輕和更均衡的貿易的政策。

- 改善安全網。

在這些政策性的建議中，有許多條是值得支持的。但是我認為，維布倫、斯氏這些‘體制改革主

義者’的批評是被一連串深刻困難所困擾的。第一點令人注意到的是，體制改革主義者是與他們所反對的市場基要主義者一樣的毫無批判地使用像‘資本’、‘貨幣’那樣的基要的範疇。維布倫和斯氏既不了解貨幣是抽象勞動的外表的異己形式，也不了解資本是集體社會勞動的外表的異己形式。所以他們兩人都有質疑金錢崇拜、資本崇拜對人類生活的主宰。

即使我們把這個極端緊要的問題放在一邊不談，維布倫之把各種“生產者”統統歸為一類、不能了解在產業資本和工資勞動之間巨大的階級分歧，仍然是令人驚異的。在斯氏的這本書中，全球經濟的產業部門中的階級分歧也沒有被包括在內。全球金融市場和國際機構時常同時傷害產業資本及其工人的利益。當然這是事實。舉例來說，IMF的緊縮方案迫使原本是獲利的公司破產，迫使工資勞動者失業。

但是，與今日的全球化有密切關係的一個最深刻的歷史發展是跨越國界的生產聯線的形成。這些聯線是由跨國資本所建立的，其目的是利用“分而治之”的戰略來對付全球的勞動大軍。例如，通用汽車公司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工人面對着可能將其工廠搬到墨西哥去的威脅，而在其墨西哥的工廠工作的工人，則面對着資本逃離到中美洲的危地馬拉、或者現在甚至於越南或中國的威脅。

在缺乏國際平面上有效的組織的情況下，資本與工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趨向於對資本有利，其結果是日漸增大的經濟不安定和更高的剝削率。從一個階級的立場來看，斯氏最終的政策目的可被描述為：使這種資本和工資勞動之間的關係，在不受金融部門無理性擾亂的情形下，在國際平面上有系統地重現。換句話說，使剝削在全球的平面上有系統地重現。

也必須指出的是，為了辯論起見，我們假想有一個不受金融部門過份干預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存在，但是，即使在那種情況下，它的特徵仍然是發展的不平衡。不過在這篇評論文章中有系統地探討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這裡我們只能作簡短的討論。

資本與資本之間競爭的中心部份，是通過對產品或生產過程創新的暫時壟斷，將剩餘利潤據為己有的那種推動力。研究和開發是這種創新中的一個緊要因素。對先進的研究和開發有享用權的資本單位，最能夠贏取這種形式的剩餘利潤。這些資本單位也最能夠建立一個良性循環，在這個循環中，剩餘利潤使提供大量的研究、開發基金成為可能，這些基金就為私佔未來的剩餘利潤提供重要的先決條

件。與之對比，無法在開頭就享用先進的研究和開發的資本單位，往往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而產生的無能力引入重要的創新，就阻止了剩餘利潤的佔用。這就反過來往往會限制日後參加先進的研究和開發的機會。這又會限制未來的創新、未來的獲利機會。

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基本動力有多種深遠的含意。對先進的研究和開發有最大享用權的資本單位，幾乎根據定義，往往會聚集在世界上經濟富裕地區。沒有這樣的享用權的資本單位往往會聚集在較窮地區。前者較易建立、保持良性循環，後者則有很大困難避免惡性循環。當較窮地區的資本單位，與對程序和產品的創新暫時享有壟斷權的資本單位，進行經濟交易的時候，它們因此必定往往會在進出口比價上吃虧。換句話說，在生產、分配的連鎖中所產生的價值，會從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區再分配到中心地區去。就這樣子，通過技術創新而佔用剩餘利潤的這種推動力——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一個內在特徵——，往往會經年累月地在世界市場上，有系統地再生產、加深巨大經濟差異。

斯氏在他對世界市場的這個描述中，一點都沒有提到有系統地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向。他在這本書中的幾個關鍵地方，提到了東亞幾個國家在最近幾十年內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增加。他顯然意指，這個“東亞奇蹟”，由於建基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在世界出口市場上成功地競爭的能力，強有力地反駁了不平衡發展理論。斯氏的立場重心是這樣的主張：在原則上，要是所有貧窮國家採用明智的政策，不被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所妨礙，它們就能在世界市場上享受到良好的成果。

斯氏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困難，是與以下事實有關：能夠在最近幾十年中脫離了貧窮的少數幾個國家都是通過“發展中國家”模式而達到的。這種“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國民經濟中的儲蓄先被“存放在中間機構中”——那就是被儲存在國家銀行系統中。第二，資本之分配到經濟的非金融部門去，必須由一個在銀行、國家機構和工業公司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洽商過程來決定。第三、銀行須持有它所貸款的公司高百分比的產權。令人困擾的是，這個模式現在正處於被拆卸的過程中。

斯氏充份了解這個模式現在所受到美國和IMF的決策層攻擊的程度，這些決策層人士希望強迫已在實行這個模式的國家向華爾街打開它的金融業的門戶。但是他既低估又高估了這個因素。說他低估，是指他不能了解，拆卸發展國家模式，對美國在這個全球制度中的霸權地位有多重要。戈溫（Peter

Gowan) 正確地把這個發展國家模式放在美國所發動的“全球大反攻”的背景中。他認為，美國之發動這個“全球大反攻”是為了對第三世界國家在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所明確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作出反應。1982年的債務危機向美國提供了對拉丁美洲和非洲許多國家發動這個大反攻的良好機會，其目的有二：

1. 以一條以西方跨國公司向目標國家直接投資、從目標國家向世界市場輸出為基礎戰略來代替一條以發展輸入品代替物、發展國內市場為主的民族工業戰略。

2. 以私營金融市場、經濟資產所有權掌握在私人資本手中、勞動市場解除管制和西方對外的直接投資和證券組合投資扮演強大角色等等來代替一條以國家為中心，在國家範圍之內的金融、工業制度。

在東亞，持續不斷的冷戰逼使美國政府接受從那些既不允許美國產品輸入（除非製造輸出品公司所需的材料、機器等），又不允許美國證券資本的投資的國家大量的輸出。隨着冷戰的結束，這種安排就不被美國的政治、經濟精英所接受了。

從這個觀點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並不僅僅反映國家機構中資本家的某一派短暫的權力。它代表世界市場中霸權勢力的基本利益。也從這個觀點來看，光是埋怨美國所控制的IMF強加了導致經濟衰退、不導致經濟繁榮這種未曾預見到的後果的各種政策，是不充足的，因為“IMF需要衰退，不需要繁榮作為推行重整計劃的背景，而IMF之需要經濟衰退作為其推行重整計劃的背景是因為衰退不但向各個主要經濟演員提供強大壓力，而且破壞勞工在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社會權力。”

由於斯氏缺乏有關於世界經濟中霸權和霸權利益的理論，所以他低估了美國和IMF對解散發展國家模式所施加的壓力。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高估了這個壓力。他暗示，要是這個壓力能夠因某種方式而被中立化，一切就好了。這種“奇蹟”就能夠再度在包括東亞在內的任何地方出現了。這種說法極度低估了目前歷史階段以下這個一般趨勢：發展國家模式朝向遠離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的方向過渡。這個趨勢在世界市場幾乎所有地區中，受到工業如金融資本大多數主要部門的支持。我們不能說它全是美國和IMF決策層的陰謀策劃。全球經濟各個角落有錢的儲戶現在都要尋求比存放在國家儲蓄系統中所得到的利潤率更高的利潤率。巨型公司寧願依靠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不願依靠特定銀行

來獲得信用貸款，因為通過後者的渠道是要受到打擾人的監管的。全球經濟中的巨型銀行，為了避免被那些難以適應急速變化的技術和經濟環境的公司所拖垮，希望擺脫與這些公司的長期聯繫。愈來愈多、愈來愈大的跨疆界的生產連線和跨疆界的公司合併、公司獲得，也使發展國家模式在全球經濟中愈來愈行不通。

在試圖評估東亞發展國家模式的成功事例駁倒了不平衡發展論這個說法的時候，另外一個要考慮的緊要事情是：在世界市場中，有系統地產生過份積累危機的傾向。這個問題也是太複雜了，所以不能在這裡作出合適的討論。就寫作本文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這一點就足夠了：當私佔剩餘利潤的欲望往往必定引起效率更高的工廠、公司進入某一行業的時候，已建立的公司或工廠決不會自動退出該行業。由於這些舊公司、舊工廠的固定資本已經“下沉”（即深深地投資）到裡面去，因此它們也許覺得它們在流通中的資本能夠產生平均利潤率就高興了。它們也許已經與供應廠商和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所以在相關時間在別的地方重建工廠或公司是不可能的或者極端昂貴的。

還有，它們的管理層和勞動力也許已經具有操作該行業的特定技能。或者，政府也許對人員訓練、基礎結構或研究、開發提供了補助，如果它們轉移到別的部門或行業去，這些補助也許就得不到了。當相當多的公司和工廠因這些原因不撤退的時候，其結果就是資本的過份積累。這種過份積累就表現在過剩的生產量和下降的利潤率上。用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明，那就是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不足以使固定資本的投資增值。在某種情況下，這個動力也許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引起全經濟範圍內的利潤率下降。

當過份積累的危機爆發的時候，先前在固定資本上的投資必定會減值。在這個時候，為了要把減值的損失轉移到別地方去或給別人，整個制度就會受到猛烈的震動。資本的每個單位每個網絡每個地區都想把減值的損失轉移給別的單位別的網絡別的地區。還有，那些控制着資本的人們就會動員大量的、任由他們支配的大量經濟、政治、思想的武器，試圖把儘可能多的減值損失，通過增加失業、降低工資和忽視工作環境惡化，轉移給工資勞動者。當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繼續進行的時候，過份積累和因此而來的減值，必定趨向於更時常、更大量地發生。全球動盪和一般化的經濟不穩漸增地變為正常事態。

以上這些考慮強有力地增強以下這個論點：所謂“東亞奇蹟”並沒有駁倒不平衡發展的理論。雖

然在某個時候，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許可以在某些出口市場上享受到很大的成功，這並不能說，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夠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市場上做到這一點。

當愈來愈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出口市場，過剩的供應品必定有增多的趨勢。換句話說，發展國家模式愈成功、它就愈接近失敗。

還有，東亞奇蹟至少局部以能向美國輸出為前提。而向美國的輸出之所以能夠被吸收，是由於美國史無前例的信貨膨脹率。這個信貨膨脹的極限——那就是說這個信貨膨脹沒有消除積累過多這個困難——表明了美國市場吸收東亞輸出品能力的極限。

斯蒂洛里茨一點都沒有提到今天折磨着全球經濟幾乎每一個主要部門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也沒有提到只有在全球規模上對資本進行大量減值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個事實。因此他沒有充份意識到，從佔主宰地位的資本和國家立場上來看，IMF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資本減值的過程是通過公司之倒閉和公司之被競爭對手所買走而發生的。當IMF強加各種條件迫使公司倒閉、迫使國家將其經濟開放給外來投資者的時候，這就是一個把減值的損失轉移給弱的公司弱的國家的合理戰略的一部份。要求領頭的資本和國家——以及它們所控制的各國國際機構——不這樣做，就是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不要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到這裡為止，我一直在爭辯說，即使為辯論起見我們假定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仍然會與社會的合理性發生衝突。在那種情況下，有系統地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向和過份積累的危機仍然會繼續困擾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但是，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斯氏的希望是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幻想。與不平衡的發展和過份積累的危機一樣，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金融危機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它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支配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專家的意識形態的力量，也不能用連接IMF、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的那一扇旋轉門來作適當的解釋。它的發生是植根在資本主義財產和生產關係的邏輯之中的。

金融業是與過份積累危機的形成有密切牽連的。從世界市場各地流來的金融資本趨向於集中在世界金融秩序幾個中心點，然後被分配到世界各地去。由於信用貨幣和虛假資本，資金的供應可以是暫時閑置的利潤、貶值損失基金和金融業為防萬一所設的準備金的倍數。就這樣，金融資本“作為過多生產和在商業上過份投機的主要槓桿出現”。

一旦過份積累的危機開始，在遭受生產能力過

剩之苦的部門的投資速度即大量減慢。以投資為目的的聯合基金再次被形成，其目的在於尋求在未來有高增長率潛力的部門進行投資。當這樣的部門被找到了，從世界市場各個角落來的金融資本就流向那個部門。如果流向這些新部門的投資資本多到某一程度，就會產生系統地朝向資本資產膨脹的傾向。當投資人購買金融資產是為了希望日後售賣它們時可得豐厚利潤的時候，期望日後從這些資本資產上賺取花紅就變成次要了。當先前在資本資產上的（紙面）增值被用來作為借錢的担保品而繼續購買更多的資本資產的時候，這就觸發了更快速的資本資產的膨脹。在這整個投機泡沫中，金融資產在基本上只不過是在生產未來剩餘價值的鎖鏈上一個環節而已。當這些資產愈來愈大的價格明顯地愈少可能被未來利潤所償付的時候，這個投機泡沫就爆破了，金融危機就隨之而來了。

過份積累危機的傾向和金融危機的傾向之纏繞在一起意味着資本的積聚和隻中對前者的衝擊也擴張到後者去。緊接着金融危機，貸款和虛假資本的貶值必定往往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量地發生。資本的某單位、某網絡、某地區要將這種貶值的損失轉移給其他單位，其他網絡，其他地區的這種壓力也因此會大大增加。情況最嚴重的是，資本要將儘可能多的損失轉移給工資勞動者及其社區的這種企圖也會加緊進行。

現在讓我再度檢討斯氏在本文前頭所提出的政策建議：

這些政策建議會不會轉變金融業使它在過份積累危機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呢？不會。

這些政策建議會不會在金融界排除投機泡沫的發生？不會——斯氏所提出的許多措施早已在美國到位，但是它們並不能防止歷史上最大投機泡沫之一的發生。

這些措施中之任何一個能夠阻止金融危機的最大泡沫損害最不能從過過久的金融活動中得到利益的團體——即男女勞動者及其社區——嗎？不能夠。

最後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是，在這些政策建議中有沒有一條建議會徹底改變產生不平衡發展的結構性機制嗎？沒有一條。

所有這些問題都植根在資本主義財產和生產關係的制度之中。瞭解這一點就瞭解斯氏的論述的局限性，不管他與新自由主義的決裂是多麼令人欽佩，甚至於多麼勇敢的。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第345期2002年11月號〕

不斷革命在新世紀的相關性

米歇爾·勒維著 兆立譯

不斷革命的理論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遐想，而是一個試圖，企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作出回應：如何用當代的語言來解決各個從屬他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遭受的驚人社會問題。他們怎樣能夠逃避貧窮化、獨裁制、寡頭政權和外國支配呢？

這個理論無疑地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世紀對馬克思主義最有意義最有創見的貢獻之一。它是怎樣出現的？它在新世紀開端的今天具有什麼意義？

不斷革命的概念——開頭只與俄國的問題有關——是在1905—1906年的俄國革命過程中，在列夫·大衛多維奇（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首次出現的。托洛茨基對這個革命的性質的論點，是在俄國前途的問題上，與在第二國際中佔支配地位的思想澈底的決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他們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1892年）的序言中，毫不躊躇地建議，如果俄國革命觸發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革命相輔相成的話，俄國現有的共有財產就可以作為向共產主義進化的一個出發點。

資產階級民主

可是，在他們逝世以後，這條思路——因被懷疑與俄國民粹主義有密切關係——被拋棄了。不久，以下的思想，成為俄國或歐洲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普遍前提——幾乎是一個信條——，那就是，未來的俄國革命必需而且必然有完全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沙皇制度的廢除、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鄉村中封建殘餘的壓制和向農民分配土地。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派系都把這個預先假定作為它們無可辯駁的起點。如果它們之間有什麼爭論，那就在於對無產階級在這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任務的不同解釋，以及誰是它的階級同盟者：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提）或農民（布爾什維克提）？

托洛茨基是第一個、而且在許多年來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提出疑問。在1917年之前，他獨自一人不但設想工人運動在俄國革命中的最高作用，巴武士、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在某些文章中也同樣有論述），而且設想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就是在1905年期間，在好幾篇為革命報刊所寫

的文章中，托洛茨基首次形成了他的新理論——後來在《總結與前瞻》這本小冊子（1906年）中加以系統闡述。他無疑是受巴武士所影響的，但是後者的思想從來沒有超過工人政府須要嚴格地實現民主（資產階級）綱領的限度：他要改變的只是歷史的火車頭，不是它的軌道。（1）

靈感

“不斷革命”這個術語似乎是托洛茨基受到梅林在1905年11月號的《新時代》（Neue Zeit）上一篇文章的啟發而得出的。不過，這位德國社會主義作家在文章中給予這個術語的意義，要比俄國這位革命家在他的著作中所表達的意義，在激進程度和明確性上，弱得多了。從1905年開始，托洛茨基獨自一人敢於建議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任務——那就是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的革新的可能性，這是被俄國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致排斥為烏托邦的、冒險的假設。

對托洛茨基的政治胆識的根源、對他的不斷革命論的根源的一個專心研究顯示，他的立場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作出與第二國際正統思想非常不同的解釋上的。這一點至少可以局部地用拉布利奧拉的影響來解釋。拉布利奧拉是年青托洛茨基第一個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拉布利奧拉探討問題的態度，他的得自黑格爾、馬克思的靈感，是與當時有影響力的庸俗實証主義和唯物主義截然不同的。

特性

在年青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在他的俄國革命理論中起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有以下一些特點：

1.作為對立的統一這個辯證觀念的信徒，托洛茨基批評布爾什維克之嚴格死板地區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政制和“工農民主專政”是“純粹的形式邏輯的運作”。同樣地，他在一段反駁切列瓦寧這位孟什維克的令人驚奇的文字中，譴責切列瓦寧的政治態度分析的（即抽象的、形式的、在辯證法產生以前的）性質：“切列瓦寧構思他的策略就像斯賓諾莎構思他的倫理學一樣：那就是說用幾何學的方法”。（2）

2.托洛茨基明確地拒絕接受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徵之一——經濟主義。這個決裂，是不斷革命論的方法論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這可由以下的《總結與前瞻》的有名文句來證明：“想像無產階級專政在某些方面自動依賴一國的技術發展和資源，就是一個簡化到荒謬地步的“經濟”唯物主義的偏見。這個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共同之處。”〈3〉

3.托洛茨基的歷史觀不是宿命論的，而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用分析發展中的革命的內在過程來發現實現它的‘可能性’”。〈4〉不斷革命並不是一個事先決定好的結果，而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現實的、客觀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的實現依靠無數的主觀因素和不可預測的事件。

4.鑒於大多數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因與民粹主義者的爭論，傾向於否認俄國社會構造有任何特殊性，堅決主張西歐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俄國的未來之間有必然的相似性，托洛茨基構思出一個新的辯證立場。他平等地批評民粹派的斯拉夫特殊性和孟什維克的抽象普遍性，得出一個具體的分析，這個分析同時解釋了俄國結構的特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趨向對這個國家的衝擊。

獨特

就是所有這些方法論上創新的結合，使《總結與前瞻》（托洛茨基1906年在獄中寫的著名小冊子）成為一個獨特的文本。他從俄國的綜合與不平衡的發展出發（當時在俄國，還沒有這個名詞的）——因為這種發展的結果，俄國就有了一個微弱、半外國的資產階級和一個現代、格外集中的無產階級——得出以下結論：在俄國、只有工人運動，在農民的支持下，才能夠以推翻專制政制、推翻土地主的權力來實現民主革命。

事實上，這個在俄國建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也得到其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有巴武士——的共鳴。不斷革命論的激進的新穎性，在於對未來俄國革命的階級性質下定義的成份，少於對它的歷史任務作闡述的成份。托洛茨基的決定性貢獻是以下的觀念：俄國革命可以超越深刻的民主轉變的極限，可以開始採取明顯地具有社會主義內容的反資本主義措施。

打破傳統的信仰

他為這個打破傳統信仰的假設辯護的主要論點十分簡單：“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支配性，是不能與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相容的”。為什麼無產階級在

一旦當政、控制了強制手段之後應該繼續忍受資本主義剝削呢？即使它在開頭將自己限定在實行最低綱領上，它也會被它的立場的邏輯引導到採取集體主義的措施。說了這個論點以後，托洛茨基進一步地相信，不把革命擴展到西歐去，俄國無產階級就會難以長久維持政權。

1917年的事件戲劇性地証實了托洛茨基在12年前的基本預測。資產階級政黨及其在工人運動的溫和派中的盟友無法回應農民的革命渴求，再加上人民對和平的冀望，替革命運動從二月到十月的激進化創造了條件。就農民而言，所謂“民主任務”，只在蘇維埃獲勝之後才得到實現的。〈5〉

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權，十月的革命家們卻不能夠將他們自己限定在只實行民主改革上；階級鬥爭的動力迫使他們採取明晰的社會主義措施。其實，面對着富有階級的經濟抵制和生產普遍癱瘓的漸增威脅，布爾什維克及其盟友被迫比預料日期更早地沒收資本：在1918年6月，人民委員會議下令實行工業各主要部門的國有化。

換句話說：1917年的革命經歷了從二月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階段到從十月開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階段的不斷革命的發展過程。在農民的支持下，蘇維埃把民主措施（土地革命）與社會主義措施（對資產階級財產的沒收）結合起來，開啓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但是布爾什維克黨，只因為列寧在1917年四月依循一個非常接近不斷革命論的前景發動激進的戰略改向，才能夠取得這個巨大社會運動的領導權。不用說，托洛茨基會本人之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者和紅軍的創建者，也在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轉變中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爭論

現在就剩下革命的國際擴張這個有爭議的問題了：各種事件是否証實了托洛茨基的有條件的預測——沒有歐洲的革命，俄國無產階級政權的命運是不是注定要失敗的了？答案：是和不是。在（1919—23年的）歐洲革命失敗以後，俄國的工人民主也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衰落並沒有像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想像那樣，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只在很久以後，在1991年以後，才發生），却導致一個未被預見的發展：工人政權被起源於工人運動本身的官僚層專政所替代。

在1920年代的下半期，托洛茨基在與斯大林主義進行激烈的政治、理論的交鋒中，詳盡闡述了不

斷革命論的國際含意。正像他的開頭的思想是被1905年的俄國革命所激勵一樣，他這時的思維是被1925—27年中國階級鬥爭的驚人爆炸所促成的。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1928年）這本書中，第一次有系統地（運用當時流行的名詞）提出了有關於社會革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的動力的論點，作為一個在世界規模上都有效的理論。它首先進行針對着斯大林主義化共產國際的災難性中國政策的爭論，指這個政策要向中國共產黨強加革命分階段（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作分離的歷史階段）和與蔣介石國民黨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教條。托洛茨基堅持主張：在中國像在沙皇俄國一樣，資產階級由於感受到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威脅，不再能夠扮演一個隨之發生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角色；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盟方能夠在一個從民主革命‘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無間斷過程中，實現土地的、民族的民主綱領。

綜合與不平衡的發展規律

以上這個分析的理論基礎，無疑是綜合與不平衡發展規律，它早已含著在1906年的著作或1928年的爭論中、但是首次在他的《俄國革命史》（1930年）中以明確的方式系統地闡述。這個規律容許托洛茨基超越那個使歷史成為一連串嚴格死板、預先決定階段的歷史進化觀念，而對歷史過程作出一個辯証的解釋：把節奏的不齊步——“落後”國家被抑制着向前發展——和“綜合的發展”結合起來。這裡的綜合發展是指不同的階段重建和睦關係，也指古代形式與較近代形式的混合。

從這個方法，就得出決定性的戰略政治結論：最先進的與最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融合/連接，那就是，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在不斷革命的進程中融合/結合的結構基礎。以另一方法來提這個問題就是：綜合與不平衡發展的主要政治結果是，未解決的民主任務必然會在各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持續。

庸俗的進化主義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拒絕接受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這個庸俗的進化主義。他着重指出，在中國及在其他“東方”國家中（拉丁美洲和非洲到那時為止還在他的興趣範圍之外），一個分開的、完全的民主階段，一個作為社會主義式的第二階段的必要歷史先兆，是不可能有的。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他們一旦取得政權，民主革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就會直接地被轉

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變成不斷革命。（6）

從玄學、抽象的邏輯觀點來看，區別兩個分開的階段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在真實的革命過程的邏輯中，它們是有機地，辯証地結合在一起的。（7）正像托洛茨基在Harold Isaacs（伊羅生）的關於中國的書的序言上所寫的，“已被不止一次地說過的是，革命有它自己的邏輯。但是這不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更不是實用主義‘常識’的半邏輯。它是更高的思想功能：發展及其矛盾的邏輯，那就是辯証法”。（8）

托洛茨基分析的主要局限性是在於“社會學方面”的，不是戰略性的：只把農民看成為革命無產階級的一個“支持”，以及看成為“小業主”階級，後者的視線不超過民主的要求。他有困難接受例如大多數兵士由農民構成的中國紅軍。他的錯誤——像大多數俄國及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錯誤一樣——就是不經過判斷審慎的調查，採納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把法國農民看成為一個分裂成微粒的小資產階級的分析，把它應用到具有非常不同特徵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然而他在他的最後著作之一《俄國革命的三個觀念》（1939年）中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把農民作為一個非社會主義的階級的評價從來不具有“絕對的、永遠不變的”性質。

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已在兩方面得到証實。在一方面，被階段論所造成的災禍，那就是，從1936年的西班牙，到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到1973年的智利，被這些不獨立的國家的共產黨盲目應用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和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產生的災禍。

預測

在另一方面，因為這個理論，像從1906年起系統地闡述的，已經大部份允許我們預測、解釋和闡明二十世紀的革命，這些革命都是在邊緣國家的“不斷”革命。不管是俄國、中國、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在所有這些國家中所發生的，在其廣泛的輪廓上，都符合托洛茨基的中心思想：在一個附庸或殖民地的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有發生綜合、無間斷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可能性。1917年十月以後的各革命運動領導人總的說來尚未認識到這些革命的“不斷性”，（有些領導人除外，例如厄爾納斯多·切·格瓦拉），或者只憑經驗地認識到它，但是使用另一術語這個事實，一點都沒有否定不斷論的歷史有效性。

這個理論已被——尤其是負面地——証實的另

一部份是與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對抗的不斷革命的觀念。托洛茨基的觀點——社會主義只能在世界規模上存在、一個邊緣國家的革命只能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是名符其實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在單一國家的國家範圍內建立起來——已被蘇聯在1991年不光彩的解體所証實。事情無疑不照他所希望的一一反官僚政治革命——那樣發生，但是蘇維埃官僚經歷的失敗，部份是對他的主要假設的証實。

不斷革命的理論並不只讓我們理解二十世紀各偉大社會革命的意義，它在二十一世紀開端的今天仍然有令人驚奇的相關性。為什麼？

第一，因為在極大多數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不管是在中東、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民主革命的任務尚未被實現：國家的民主化——和非宗教化——、從帝國主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使貧苦大眾不受社會排斥、或者農業問題的解決等等問題仍然在議事日程上。依賴現象已取得新形式，但是這些新形式不比過去形式的野蠻性、束縛性少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通過新自由主義“調整”計劃和嚴酷的還債條件等機制對欠債國（那就是幾乎全部的地球南部國家）的獨裁。人們可以說，環球財政制度的這些機構為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美國服務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所施加的權力，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比過去的新殖民制度所施加的權力更直接、更專制、更全面。

複雜性

那末，這些國家的革命只能是這些民主要求和資本主義被推翻的一個複雜而有明顯特徵的結合。

今天，像昨天一樣，將要在處於制度邊緣的社會中進行的革命轉變，不等同於在中心的國家的革命轉變。印度的社會革命，從它的綱領、戰略和動力等方面來看，不能像英國的單純的“工人國家”。今天在許多國家中，由原住民和農民運動（墨西哥的薩巴達民族解放陣線、巴西的無地農業工人運動、厄瓜多爾的厄瓜多爾原住民民族聯盟）所扮演的——當然未被托洛茨基所預想的！——決定性政治角色，証明了農業問題的重要性、社會爆炸性以及它與民族解放的密切聯繫。

人們不能想像，例如，巴西的一次社會革命，如果不着手進行有效的國家民主化、民族的解放、激進的農業改革，如果不尋求一條自治的經濟發展道路，却會朝向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社會需要。反過

來說，只有一次社會的——那就是說，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才能夠在一個“不間斷的”社會轉變過程中，實現這個民主綱領。

在地球南部各國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對世界財政機構、反對不人道的外債制度、反對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強加“調整”政策而引致驚人社會後果的各個鬥爭中，民族問題仍然有着迫切的相關性。

錯誤觀念

在這點上，我們重新看見民族主義式的錯誤觀念的盛行——在有或沒有源自斯大林主義的政黨參與下。這些錯誤觀念是認為有以下的種種可能性：

“民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促進、與民族主義者軍方結成戰略同盟，或者支持一條面向國內市場的“獨立經濟道路”的各階級廣泛合作。

不斷革命的理論，在讓追求民族解放和反對新形式的帝國主義統治取得決定性地位的同時，讓我們能超越以上所說的錯誤觀念，緊緊地把握住在單一的歷史運動中民族民主鬥爭與社會主義鬥爭之間的不可分割性。

在許多邊緣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在前蘇聯、東歐各國中，民族問題也正取得一個特別令人不安的新形式：在不同種族之間的血腥衝突。這些衝突發生在不同社區之間，或者在不同宗教之間，大都是被反動的、時常是法西斯式的勢力所推動，而不管是否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操縱。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革命，提出建立真正民主的聯邦或邦聯的解決方法，來打破社群仇殺和報復的循環。這個聯邦或邦聯的解決方法，保證少數民族的民族權利，而且為各民族的工人之間的團結創造條件。這對東南亞、南亞、中東和巴爾幹半島各國特別適用。

對托洛茨基而言，不管各依賴國家的社會矛盾有多深遠，革命從來不是“必然的”，而是資本主義危機或貧窮加劇的“必要的”產物。人所能推進的，只是作出一個有條件的建議：當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革命——在不斷的過程中——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南部國家、邊緣資本主義國家就不可能開始解決那折磨它們的“聖經所說的”（借用埃內斯特·曼德爾的一個表達語）以下問題：貧窮、苦難、失業、社會不平等、種族歧視、食水及食糧的短缺、帝國主義統治、專制政權和大地主對土地的獨霸。

〔按：本文作者米歇爾·勒維（Michael Lo wy）著述甚豐，其中最主要的有：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Verso出版社，倫敦，1983年）

〔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9、10月合刊〕

註釋：

〈1〉關於巴武士與托洛茨基的分歧，見Alain Brossat, 《Aux origines de revolution permanente: la pense s poitique du jeune Trotsky》，巴黎1974年版。關於列寧、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三人之間的思想的趨同和歧異，見Norman Geras 的出色的書《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倫敦，新左派出版社，1976年版。

〈2〉托洛茨基，《1905年》，企鵝出版社，倫敦1973年
版。

〈3〉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總結與前瞻）。該文刊在《The Permanent Revolution》，尋路人出版社，紐約，1969年版，第63頁起。

〈4〉托洛茨基，《Results and Prospects》，同上書，第36頁。

〈5〉像列寧會在以後寫道，“就是布爾什維克，…憑藉無產階級的勝利，幫助農民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底”。

〈6〉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7〉同上書。

〈 8 〉 Harold Isaac, 《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 中國革命的悲劇 》), Seeker and Wauburg出版社, 倫敦, 1938年。見托洛茨基在該書上的序言。

關於《歷史不會停 信念不會改》一文的更正

兆立

最近讀到浪果寫的遊墨西哥文章，這篇文章寫得很動人，引起了我對墨西哥及里維拉、弗里達、卡羅等人的興趣，所以讀了幾本書，也看了一部以卡羅為主題、片名為Frida的電影。之後，我發覺浪果的文章中有一些錯處。現在把我看到的錯的地方寫在下面：

(一) 弗里達·卡羅的原名不是Flida Kahlo，是Frida Kahlo。

(二) 浪果引用嚮導荷西教授的話，說里維拉的“壁畫早已遍佈世界各地，包括在紐約的那驚動世人，畫有列寧、托洛茨基等人，題名《新工人學校》的一幅……。”前一段話如果是指墨西哥各地及美國的舊金山、底特律和紐約等地，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荷西的後一段話就與事實不符了。里維拉的那幅“在紐約驚動過世人的壁畫”，題名是“Man at the Crossroads”（在歷史轉折點的人類）（這題目是RCA大廈的主人洛克菲勒先生自己取的，他那里會取〈新工人學校〉這個題目呢？）。畫中有許多人物，但是在革命陣營的，只有列寧一人及手牽着手的工人、農民和兵士，並沒有如荷西所說的，有列寧、托洛茨基等人。就是因為里維拉把草圖中的勞工領袖畫成列寧，大廈主人才沒等到他將全畫畫完，就強迫他停畫，並令人將這畫用布

幕蓋住，不久以後，還將它毀掉。這事發生在70年以前（1933—1934年）。當時二十幾歲的人，現在都九十多歲了。為什麼荷西教授問人們有否在紐約看過了？我真不懂。

〔附及〕里維拉以後在墨西哥重畫了一幅壁畫，畫中加了托洛茨基、馬克思等人。浪果文中一點沒提到此畫。這幅壁畫是在藝術館二樓，論氣魄及影響力當然不及原畫，因為原畫是在紐約RCA大廈大廳對着正門的大牆壁上，當初洛克菲勒為了大廈新蓋，需要世界級畫家的畫來吸引租戶，那知里維拉畫了一幅共產主義壁畫，這就是此畫驚動世人之處。

浪果的簡單回應：

謝謝兆立先生提出的指正。《遊記》是99年的舊稿，當日行色匆匆，一切祇能草草擇記，像我親眼看到的，王宮靠左梯旁畫有馬克思的一幅，我記下的是：“階級鬥爭”（The struggle of the classes），靠右梯旁的一幅是“羽蛇神的傳奇”（The legend of quetzalcoatl）；但只靠耳朵聽來的就不免抽象，也不敢說不是自己聽錯，卻錯怪別人說錯的。現在，除Frida的名字中的L誤寄外，其他地方也作出改正，那最好不過了。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五)

曼得爾著 兆立譯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其人

自信，對他的歷史任務的信念堅定不移，對人對己都很嚴格，對物質特權和對人生的小型苦樂並不關心：這些是托洛茨基在歷史書和報告中(當然除了斯大林主義的詆譭以外)的主要形象。這個形象並非虛構。它反映托洛茨基的個性、強處與弱點的某些方面。但是，這些只是部分而已。它們所描述的，不是托洛茨基整個人，他的積極參與了四十五年的世界歷史。

在他一生的鼎盛時期，他知道怎樣直接與群眾通話，可能比這個世紀任何其他社會主義領導人更直接。若雷也是一位偉大演說家，也許比托洛茨基還要偉大，但是他從來沒有機會直接向革命群眾說話。有這樣做的能力不只是演說方面的天賦，那是卓越的政治天賦。上面所提的他性格的這些方面，並不向我們顯示這樣一個人：在政治勝利的時期，他能夠保持千千萬萬人的同情和無止境的贊美，而在最痛苦的失敗時期，他能夠爭取、保持許多人的緊密友誼。它也沒有向我們顯示這樣一個人：在最大的個人失敗和最痛苦的失望後，他仍然能夠表達他的歷史樂觀主義、他對人類前途的信念、他對建立一個非暴力社會的信念、他對自然、藝術的美幾乎像孩子般的摯愛和他對生命的無可動搖的肯定。

他在1940年2月所寫的遺囑，用以下的句語作終結：

“娜塔麗亞剛從院子裡走到窗外，將窗子開得大一點，使更多新鮮空氣自由地進入我的房間。我能夠看到牆下鮮綠的草叢、牆的上面青藍的天空以及到處的陽光。人生是美麗的。讓後代的人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這種對一個非暴力的未來社會的信念，在當時那兩個大謀殺者希特勒和斯大林似乎快要得勝的時刻，並不是人人都可了解的。

托洛茨基像他之前的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將“我是一個人，沒有人性的事情對我不相容的”這句古羅馬格言施用在他自己身上，是不能被本章開頭所列的各個性格特徵所合適地描述的。他的個性、他的思想、他的行動和他的情感都是受到以下

三個特徵所決定性地影響的：(1)一個自發的、在其生命的很早時期即為工人階級及其解放而獻身的、反對一切形式的非正義和壓迫的反叛精神；(2)一個同樣是自發的、對理性、對以了解解釋社會現實為改變社會現實的先決條件的強烈欲望；(3)一個始終如一地把世界和歷史看成為進步與後退、革命與進化、革命與反革命、理性與非理性、人道與非人道正在進行不斷的鬥爭的矛盾過程、其結果我們無法準確預測的觀點，換言之，一個獨一無二地、深刻地辯證的觀點。

托洛茨基性格的這三個基本特徵使他成為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嚴厲地批判第二國際的政治宿命論，認為我們世紀的戲劇中的一個決定性角色屬於歷史中的主觀因素的馬克思主義者。〈2〉這些特徵也包含了一個強烈反教條主義的因素，一個這樣的確信：只有我們的政治行動的長期結果才將會讓我們對它們的合理性、有效性或者歷史正當性作出判斷。這就是為什麼在他一生中他在政治上不像列寧那樣自信。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些關鍵時刻，躊躇為他的信念而立刻、堅定地戰鬥。他的親密朋友之一，越飛〈3〉，在他的遺囑中寫出了這點。

他有非凡的知識能力和文學才能。他不顧他的健康較差，仍舊精力充沛，保持比常人多的工作量。他嚴格律己，而且期望他的最親密朋友和同事也能如此。他在政治上的堅強、他的尖銳的辯論和他辛辣的諷諷文體都使人想起列寧，不過有一個重要分別：他比列寧更甚，而且包含一個個人特徵，使日後的調和更加困難。蕭伯納有一次以他特有的諷刺語調說，托洛茨基把他的敵手們的頭砍了下來，以證明他們的肚子裡一無所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只發生了五次這樣的調和：在1919—22年時期與布哈林，在1925—27年與他的內弟加米涅夫的短期調和；與他的親密私人朋友，法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羅斯默(Alfred Rosmer)的長期友誼〈4〉；1917年二月革命後與列寧；在他在世最後一段日子中與莫里弗(Raymond Moliver)和法蘭克(Pierre Frank)。雖然他覺得他的政治觀點比布哈林、加米涅夫和羅斯默等人優越，他在1917年以後與列寧的關係，是一個有才幹的同僚、學生與他的老師的關係。這個態度在1917年

後在與列寧的分歧中也沒有改變，例如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及工會問題的爭論上。他在爭論之後尋求調和的能力有限，意味著他在團聚一群有獨立思想、能不顧他的巨大權威仍然願意批評他的幹部方面，沒有像列寧那樣的成功。他最親密的同僚們，與同列寧共事的那班人比較起來，是更均勻的、如果不是堅如磐石的一群人的話。當然，也從較少數目的人們中去選擇。可是有重大的例外。1917年的麥日拉約恩卡團體包括像盧那查爾斯基、馬努伊斯基、里亞扎諾夫、烏里茨基、佩特羅夫斯基、越飛和沃洛達爾斯基等人物。雖然盧那查爾斯基以後對托洛茨基批評得很厲害〈5〉。馬努伊斯基日後變成斯大林主義者，烏里茨基、沃洛達爾斯基和越飛都仍然是終生朋友。內戰時期與他同在那部出名的火車上工作的人們，特別是斯克梁斯基、布托夫、謝爾穆克斯和他的秘書，後來被斯大林逼到自殺的格拉斯曼到最終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左派反對派在1923年至1932年之間的領導層包括像賴可夫斯基、別洛鮑羅多夫、斯米爾諾夫和姆拉奇可夫斯基那樣的出名人物，這些人在這十年中組成了一個盡職的領導班子。在普列奧勃拉任斯基、皮亞塔可夫、拉狄克和斯米爾加等人向斯大林投降之前，托洛茨基也與這些出名的布爾塞維克領導人密切地工作了八年。在第四國際的準備，建立期間，他與像斯內夫利埃特、安德雷斯·寧、陳獨秀、詹姆士·加農和萊翁·利索爾等共產國際前領導人密切工作了許多年，不願與他們的意見分歧。〈6〉

雖然他進行政治爭論的態度是強硬的，他在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圈子中卻是特別溫暖的。這是大多數與他共事過的人們所強烈著重的。以下是熱昂·范里耶努爾特對他的描述：“對訪客及所認識的人們，托洛茨基是特別友善的。他講話、解釋、做手勢、問問題，有時候真正是有魅力的。……在1932年至1939年之間在我所見到的托洛茨基的訪客中，只有里維拉(Diego Rivera)托洛茨基對他最溫暖最坦率。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像對里維拉那樣的信任、自然和放鬆。”〈7〉

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著重於他的謙遜：“人通常不是根據他或她的品質或缺點作出評價，而是根據與他或她的接觸愉快或困難而評價的，因此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時常是片面的或不公正的。例如，很少人知道他被加於自身的貧困。如果當年他願意利用他的地位使他能享有他的地位所應有的特權的話，他和他的家人可能會生活在較好的環境中。”〈8〉

馬克斯·伊斯曼雖然對於在普林基博與托洛茨基會面的一般印象十分不好，但是承認“托洛茨基是他所知道的所有出名馬克思主義者中最謙虛的一位。他從來不自吹自擂，從來不說他自己或他自己的成就，從來不在會話中強迫對方接受他的意見”〈9〉

這個在強硬的辯論家與謙虛的人之間的，明顯可見的矛盾，在我們回憶起托洛茨基做人的一個重要特徵的時候，就自行消解了。他做人的這個重要特徵是：他要求為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為他自己的豐富的、各種各樣的個人興趣和感覺，保持一個自由的、與他的政治承諾分離的空間。這是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共有的一些東西。在所有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們中，可能是羅沙·盧森堡掌握這點比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所有其他人都好。布哈林在這方面很像托洛茨基，不過他的興趣不是很多種多樣的，不是很深刻的。列寧有同樣的要求，但是他把這種要求看成為一種誘惑。他是所有偉大社會主義者們中最政治化的一位，他的所有活動都依據專一的目的。這種對一個人的私人生活的任意約束，是否加強了這個人的政治判斷，或者是使這個人的政治判斷變成模糊，我們還不能從具體歷史經驗中得到清楚的答案。伊薩克·多依徹在他所寫的托洛茨基傳記中描述了托洛茨基在維也納與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一起居住、並且擔任讀者眾多的激進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的記者時的多種興趣和活動：

“根據報導，這個家庭過的是平靜而快樂的生活。這位革命雄獅是一位忠實的丈夫、慈愛的父親。因為他急於要幫助他的妻子、使她能夠追求她的藝術興趣和了解俄國僑民的政治生活，他幫忙做家務、養育孩子。後來，當孩子們上學了，他定期幫忙他們做家庭作業，甚至在他全家搬到巴黎，在戰火正濃的年月裡，他仍抽出時間這樣做。就謝多娃而言，她重新在維也納對她的丈夫進行藝術教育，這是她1902年已在巴黎開始、但是起頭沒有成功的工作。夫妻倆一起在伯格希洛斯和在維也納各畫廊所收藏的豐富的藝術作品之間度過了許多日子。他對藝術的興趣明顯地正在增加：在他到巴黎、慕尼黑或倫敦去參加政治會議的時候，他時常會偷偷地跑到羅浮宮、泰特美術陳列館或其他地方去參觀那裡的藝術收藏品；他在這個時期的文章，特別是他為《基輔思想報》所寫的評論維也納年度展覽的文章中，顯示出他對歐洲藝術思潮有比一般涉獵者稍高的欣賞力。當政治與新聞報導的工作只需要他的一部分時間的時候，他也擴大了對於法國、俄國小說、對於德國詩歌早已是廣泛的通曉；這也反映在他當時的文學論文上”〈10〉

托洛茨基在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描繪中，讓大家注意到革命者在純政治和心理這兩方面的特性：“我所會面的是戰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中的傑出人物，是議員、作家及記者。在那些會面中，我學到了理解，在一個人的腦子中可以包容各個成份的特大變化，以及在僅僅對一個體系某些部份的消極同化與對整個體系在心理上完全再創造之間、與根據一個體系的精神對這個人再教育之間的巨大距離。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理只

能在社會大災難，與傳統和習慣作出革命性決裂的時代中形成；可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往往顯露他自己是一個像研究法律那樣學到馬克思理論的某些部份、靠從《資本論》中學到的皮毛過活的庸人。在舊的、帝國的、等級森嚴的、徒有虛偽的、微不足道的維也納，馬克思主義院士們寧可以一種感官上的喜悅彼此稱呼為‘Herr Doktor’（博士先生），。工人們時常稱呼這些院士們為‘Genese Herr Doctor’（博士先生同志）。我與這群上層份子中任何一個人從來沒有作過一次真誠坦率的交談，雖然我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成員，出席它的各種會議，參加它的各種示威遊行，為它的各種出版物寫文章，而且有時候以德語發表簡短演說。我覺得與社會民主黨的各領導人格格不入，我反而發現在會議中或在五一示威遊行中十分容易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進行交談。”〈11〉

托洛茨基性格的這種多面性使許多觀察者驚異。比利時社會民主黨領袖亨得利克·德曼承認他自己難以相信托洛茨基在建立紅軍時扮演了領導角色。他認識托洛茨基是在後者在維也納流放的時候。他覺得托洛茨基在第二國際布魯塞爾局開會時的樣子像典型的“神經質的、不能律己的咖啡館文人”。

〈12〉他看到了這個形象並不符合1917—20年的托洛茨基。他就以他典型的半馬克思主義的看問題態度作出結論：革命會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當然，他沒有看到，這個在每一個歷史人物的生涯中所顯示出來的新特性的核心，必定早已在過去存在。

這個多面性，以及它的所有弱點，不應該掩蓋我們對他在歷史中角色的全面判斷。他對他的歷史任務的確信，並不是由於他誇大了他自己的重要性。托洛茨基在以下幾個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社會與個人發展的交互作用，是只有他才能扮演的：〈13〉

1.十月革命之前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在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兵士們中間的幾個決定性的星期中，以及在十月暴動的決定性日子和時刻期間，和在暴動與民主選出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之間的具體聯繫上。

2.在紅軍的建立上，和在決定那個會導致內戰的勝利、導致蘇維埃政權鞏固的政治、社會戰略上(1918—1920年)。

3.在他早先對黨、國家和工會內部的官僚化程度的認識上，和在他決定對支持這個過程的斯大林派，發動不妥協的鬥爭上(1923—27年)。

4.在他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勝利代表一次有歷史意義失敗的認識上，和在他以“從上和從下來的”聯合陣線阻止這個失敗的企圖上(1930—33年)。

5.在他面對著國際勞工運動的歷史性失敗這個將要籠罩著每個人的‘世紀的午夜’的時候幾乎無希望地試圖挽救革命馬

克思主義的歷史連續性上(1936—40年)

托洛茨基曾經經常被人指責為教條主義，例如被法國哲學家梅洛-蓬蒂、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他的傳記作者以色列人巴魯奇·克內一帕茲。這個指責是以對科學的不正確了解為依據的，而且提出一個有關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科學的理論永遠是試探性的；它們都是實行中的假設。這些假設一定要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且能夠被經驗的資料所證實或證明為虛假。因此，教條主義(即拒絕讓一個假設接受這樣的核實過程)和絕對懷疑主義都是不科學的。但是，一個假設的科學性不能被否認，假如這個假設，例如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內在的、影響全系統的特性的論點，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實。否認這個假設的科學性會等於退向非科學的迷信。托洛茨基對這個論點，對其他同樣是科學的，與了解這個世界極有關係的論點的保衛，並不表示教條主義，而表示他對科學的認真。

另一個指責，例如由梅洛-蓬蒂所作的，是與據說原先來自馬克思的客觀主義問題有關的：“對於某些認為他自己知道未來的人而言，個別事件是沒有意義或重要性的；不管怎樣，未來總會表現”。但是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它是一個邏輯上的謬論。讓我們假定，有人認為歷史的可憑經驗來證實的(和已被經驗所證實的)規則性是理所當然的。為什麼這個人在有了新的，與經驗有關的證據的時候不能夠以批判的眼光來檢驗這些規則的真實性呢？

在這個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有時被描述為托洛茨基的救世主似的預言——的背後，隱藏著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兩重性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將嚴格的科學和絕對命令結合起來，被年青的馬克思公式化、年邁的馬克思重述和完全重申為：“推翻人在一切環境中成為一個被降低了人格、被奴役、被忽視和可鄙的人的一切環境的絕對命令”。〈14〉

托洛茨基在他的《戰爭中的蘇聯》(1939年9月25日)一文中，以古典的引人注目的方式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兩重性：“如果不管怎樣大家都承認目前的戰爭不會引起革命而會引起無產階級衰落的話，那末就剩下另一個可能性：獨佔資本主義的更加腐爛，它更加與國家融合，和不管在那裡所剩餘的民主之被專制政權所代替。

“歸根究底來說，這個歷史性的選擇就是：要麼斯大林政權是在轉變資產階級社會為新社會的過程中一個令人憎惡的重新墮落，要麼斯大林政權是一個新剝削社會的第一階段。如果第二個預測證明是正確的話，那末，官僚層將會變成一個新剝削階級。不管實現第二個遠景會是怎樣艱巨的工作，如果世界無產階級證明它自己不能夠實現發展的過程所交給它的歷史任務的話，那末除了承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為基礎的社

會主義社會綱領只不過是烏托邦以外，沒有其他的解釋了。不證自明的是：爲了保衛極權主義官僚社會的奴隸們的利益，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最低’綱領。”〈15〉

以上論點的第一部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完全的科學性。第二部份證實了絕對命令的有效性，即使是在特別情況之下(可喜的是，這種特別情況還沒有發生)。《托洛茨基文件》的編輯者詹·梅哲相信，他已在托洛茨基的個性中發現了一個大矛盾，即他的歷史的和立即的政治角色之間，戰略家和策略家之間的緊張狀態。〈16〉這個緊張狀態無疑是真實的。但是它不是托洛茨基所持有的特徵和弱點。它是人類一般的特徵。

人類的活動總是(有意識地、半意識地、無意識地)朝向某個目標的也即是實用的。人類活動的目標總是要在人與自然或與社會的關係中爲個人(或整個人類或社區)的存在條件帶來某些改變。但是在開始的情況的辯證中，主動主體和最終結果，客體以及主體都被改變了。最終結果決不可能恰好是開頭所預測的，而可能與當初所想要的完全相反。我們對結果的判斷可能因時而異。短期成功可能到結果是長期失敗，短期失敗可能會是長期成功。另外，人類的每一個活動不只是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另類途徑。不去想辦法，保持被動，也能影響我們自己的及其他人的生命。經院哲學家十分正確地認爲疏忽之罪應該與真正犯罪一樣受到斥責。

我們能從這些一般的觀察中得到的唯一結論是，完善的、能達到目的的政治行動——完善的戰略和完善的策略——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們所能做到的是在各種優先考慮的事情中間，根據最佳的認識，作出最佳的選擇。托洛茨基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最佳的並不是完善的。那些在托洛茨基的身旁爲著延續活生生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爲著建立一個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的人們，以及那些在他死後繼續這個工作的人們，一般地都被稱爲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名稱本來是他的反對者所起的。〈17〉托洛茨基本人從來沒有用過它。第四國際的支持者寧可稱他們自己爲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因爲他們認爲，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二十世紀其他的偉大社會主義者們，都對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有著巨大的、有價值的貢獻。但是他們並不因被稱爲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受窘迫，反而很高興地如此稱呼他們自己。對他們而言，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應在四大偉大神殿中替換斯大林的新偶像。他當然不是永不犯錯的政治教皇。像馬克思、恩格斯、盧森堡、格拉姆斯齊等人一樣，托洛茨基也犯過一些分析上及政治上的錯誤。我們今天的任務是要批判地檢驗這些錯誤，而這樣一種批判就是近代革命社會主義的一部份。

但是，根據這個世紀的全部歷史經驗，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會聲稱，在所有的思想家和社會主義者之中，最清楚地認出

我們這個世紀的主要問題、並對這些問題提出最佳解答的是托洛茨基。今天爲這些解答所作的鬥爭，對於人類的前途而言，是與在1906年、1917—23年或1936—40年所作的鬥爭一樣重要的。

在西歐的左派中，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偏見仍然很重。我只要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德國，貝恩特·拉貝爾及其同僚們，在重新出版庫爾特·曼德爾從1920年代以來關於改良主義的思想和社會背景的、有趣的文章方面，功不可沒。庫爾特·曼德爾鮑姆在1928年得出結論說，“從俄國開始的那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成功將要依靠無產階級在各工業發達國家的勝利”。〈18〉也許是由於缺乏資料，他沒有提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他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鬥爭。現在，經過了三十五年以後，拉貝爾及其同僚們在他們對重新出版曼德爾鮑姆著作的評註中也忽略了托洛茨基。他們列出羅莎·盧森堡、路卡克斯、科須和曼德爾鮑姆，但沒有列出托洛茨基以無產階級的自我組織、自我活動爲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概念(戰略)的泉源。從任何觀點來看，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在托洛茨基被暗殺的50週年之後幾個星期(1990年)，蘇聯電視播映了一部關於托洛茨基的傳記式影片。影片的名字是(從他的遺囑中取來的)《生命是美麗的》(‘Life is Beautiful’)。在這部影片中他被描繪爲一位溫暖、謙虛的人。在1990年8月17日，蘇聯《消息報》登了一篇關於托洛茨基的文章篇文章，描述托洛茨基爲“一位偉大而無可指責的革命家”，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

在托洛茨基被殺後的次日，德國作家阿諾德·茨魏格寫了一篇令人感動的訃告。50年以後，在1990年，這篇訃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表了：“列寧的逝世，對這位他習慣於稱之爲‘筆桿子’的人來說，對一位具有在曾被斧頭擊碎其頭顱的人們中最有價值、最有組織能力的頭腦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托洛茨基從孟什維克走向列寧。他帶來了他的全部的能力、才智和革命熱誠……”

托洛茨基，畢其一生，爲所有愛人類文明的我們而鬥爭，對於所有愛人類文明的我們而言，這個文明就是我們的國籍。他的兇手不管是誰，在殺他的時候，是要毀掉這個文明，我們的祖國。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把托洛茨基畢生所從事的工作從始終存在的腐爛的威脅中挽救出來。對托洛茨基而言，畢生所從事的工作是世界革命：如果以不過份、簡單的方式來表達的話，這意味著將人類文化推廣到數以億計的文盲，或著，像盧那查爾斯基所表達的，它意味著所有這些人民的眼中有著一個不同的表達方式。”

南非作家羅納德·西格爾以十分相似於阿諾德·茨魏格的

格調來總結他的批判性的托洛茨基傳記：“〔托洛茨基〕為人民的權力而發言，反對那些為國家的權力而發言的人們。他發言反對那些要其他人順從的人們享受特權。他對那些以他們的思想獨尊的人們發言，要求思想的解放。他向那些只知道為對異議的威脅而說話的人們發言支持不顧代價進行抵抗的意志。

“就是以這個革命的聲音，托洛茨基仍舊為人類而發言。．．．他對這樣一個世界發言，在這個世界中，有些國家的倉庫裏堆積了如此多的剩餘食物，其容量要用從地理學上借來的名詞來描述；但是在離它們幾小時噴射機航程的地方，饑災不需要護照即可穿越邊境。而且只要財富在創立一個宣佈它自己是一個自由的泉源、但是提供財產的限制的制度的過程中不到充裕的程度，他就要發言。．．．

托洛茨基相信，人只有不得不認識到圍繞他們的籠子才找到脫逃的方法。而且他特別打擊了心中的這樣的籠子：把贖罪交托給另一個世界來保管的原罪的籠子；或者報告過往的重覆的警告、報告未來的相應的約束的、永久的原始獸性的籠子，他仍然為對人的想像力和理性的允諾而發言。．．．

“在一個有這麼多各別的無效行動的時代中：當這麼多智識份子坐在事件的邊緣哀叫、這麼多藝術家轉頭不看而忍耐其情感的時候；當政治是白領職業的一個特別形式、當士兵要求兵權的所有道德投資的時候：托洛茨基就是那個基本的革命家、完整的人具有創造力的證明。．．．在他下台後的長時期中，托洛茨基始終對他自己忠實，以他對生命的熱愛來回答他周圍的那麼多的死亡，以他的信念來回答這樣多的絕望。而且他是以這個精神為人類的喜悅和反抗而言的對於這些喜悅和反抗，是沒有一次失敗能夠阻止的。”〈20〉

從阿諾德·德茨魏格和羅納德·西格爾的評價推衍下去，我們就會對托洛茨基的歷史角色作出以下的總結：他體現了那個不屈不撓的、不顧對他自己的命運的任何影響仍要抵抗今日世界上一切非人道的事物的意志。這個意志最清楚地表現在他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斯大林主義上面。這種抵抗的意志，這種抵抗的文化，是與對宿命論、順從或拍馬的堅決反對一起存在的。那是建基在科學上和道德上都是堅實的信念上：有效、集體的抵抗有時是可以成功的，因為在特定情況中，工人階級有能力勇敢地面對和推翻壓制的統治關係。為這一點創造必要的組織方面的先決條件，是抵抗的文化的一部份。

經過了七十年的謊言和誹謗，經過了五十年的沉默：歷史的磨坊慢慢地磨，但是它是在磨。鑒於現時在俄羅斯和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沒有任何懷疑，歷史將會還給托洛茨基完全的道道。

(全文完)

註釋：

〈1〉《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紐約1969年及1973年版，第139頁。

〈2〉這在第四國際過渡綱領中是以以下方式表達出來的：下一個時期——一個從事鼓動、宣傳和組織的革命前時期——的戰略任務在於克服革命客觀條件的成熟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思想混亂和失望，新一代的無經驗)之間的矛盾。．．．“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第四國際文件》，紐約1973年版第182及181頁。)

〈3〉托洛茨基在維也納流放時與越飛結成朋友越飛是一位受過教育、多才多藝的革命社會主義者。他在當時患了一種神經紊亂症，正接受佛洛伊德的學生阿德勒的治療下。他使托洛茨基知道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的重要性，這門學問便成為使托洛茨基終其餘生深愛的科目之一。越飛不顧他的健康問題，在十月革命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後來他成為一位出名的蘇維埃大使。他在1927年自殺身亡。他的喪禮成為左派反對派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次大示威遊行。他和賴可夫斯基都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至1927年間的最親密政治及私人的朋友。

〈4〉羅斯默(Alfred Rosmer)是法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在1920年至1922年之間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曾是左派反對派一位成員，直至1930年因與多數派發生政治和組織的分歧而離去。他在1936年成為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

〈5〉見盧那查爾斯基在其《革命份子的剪影》(倫敦1967年版)一書中對托洛茨基的描寫。

〈6〉托洛茨基與共產國際領導人、印尼及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創立人斯內夫利埃特的親密友誼延續了7年。他們在1937年因西班牙革命問題的意見分歧而失和。詹姆士·加農是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萊翁·利索爾比利時共產黨的共同創立人、領導人。陳獨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莫里弗和法蘭克都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至1936年之間的工作班子中最親密的成員，但是因對法國當時局勢的不同策略問題而與托洛茨基失和。

〈7〉范黑耶努爾特《在托洛茨基近旁的七年》巴黎1978年版47頁。

〈8〉安吉利卡·巴拉巴諾夫，《對列寧的感想》，密歇根1968年版，第132頁。

〈9〉馬克斯·伊斯曼，《偉大的同伴們》紐約1959年版。

〈10〉伊薩克·多依徹，《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184頁。

〈11〉《托洛茨基自傳》，紐約1960年版，第208—9頁。

〈12〉亨得利克·德曼，《逆流而上：一位歐洲社會主義者的回憶錄》，斯圖加特1953年版。

〈13〉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角色這個複雜問題，見曼德爾在倫敦1986年版的《新左派評論》(總第157期)上的‘個人在歷史中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實況’一文(在該期第61—79頁)。

〈14〉見在《早期著作》中的《對黑格爾的權利哲學的批判的導言》一文，Harmondsworth 1975年版，第251頁。

〈15〉《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1973年版，第9頁。

〈16〉詹·梅哲，《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71年版，第二卷，第843—5頁。

〈17〉‘托洛茨基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次是由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人物、立憲民主黨的首領密留可夫所起的。

〈18〉庫爾特·曼德爾鮑姆，《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柏林1990年3、4月號，第317、326頁。

〈19〉《意識與形式》1974年版，第25頁。

〈20〉羅納德·西格式，《托洛茨基的悲劇》，1983年Harmondsworth版，第404、405、406頁。

Can CCP build a society of harmony?

Zhang Kai

Recently, Hu Jintao, holding the top position of the party, military and state leadership, declared that the building of a socialist society of harmony is one of the primary tas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initiating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said, the society should be one where there is democracy, justice, honesty, friendship, dynamism, order, tranquility,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Wen Jiabao, the Premier, also stressed that building a socialist society of harmony is a key mission in the Government's Work Report.

These statements come at a time when China has experienced over two decades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State Council, on February 24, issued a document "On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individually or privately run businesses in the non-public sector". The *People's Daily* reported that privately run enterprises now constitute about 40% of the nation's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income from sales, and over 60% of the nation's commodity sales and retail sales. Together with foreign capital, the non-public sector now constitutes over half of China's GDP, and the majority of jobs for urban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These figures unequivocally tell us that in China,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c forces are predominant. The Government's Work Report declared that China would "implement its promises in its accession to the WTO, continue to lower customs tariffs, enlarge opened areas... and fully let go the right over foreign trade." The pillars supporting a non-capitalist state have been eroded.

Wen Jiabao's Report acceded to underlying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agricultural base is weak, peasants' increase in income is difficult, strain of energy is a cune, and pressure for inflation is high.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tensions have aggravated,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rural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The pressures from unemployment, irr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ow level of skills are all bothering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orruption, bureaucratism, inefficiency, extravagance are listed.

If the Government Report is vague about these problems, social surveys give the details. T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s "Analyses and Projections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2004-2005 listed the following seven problems: 1. About 40 million peasants are landless; 2. Income discrepancy is such that in a survey of 50,000 urban household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4, the 10% highest income group had a dispensable income of RMB 13,322 yuan, whereas the lowest 10% income group had only 1,397 yuan to dispense with; 3. Every

year, 24 million people enter the labour market, but new jobs are only 9 million a year; 4. Poverty alleviation remains a daunting task, and the level of absolute poverty in the countryside is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625 yuan,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United Nations level of about 900 yuan; 5. Anti-corruption can rely only on political systemic reform, yet the forces against corruption are too weak in China; 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eriously constrained by resource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7. Despite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degree of contentment with life among the low income groups is going down.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due to the influx of cheap agricultural products, peasants' livelihood has gone for the worse.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World Bank Report, in these three years, average income of peasant households has gone down by almost 1%, and that of some peasant households in stark poverty has gone down by 6%.

The government has acknowledged the severity of the rural problems, and ha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tariff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lifted, and the state's investment into agriculture this year is 70 billion yuan.

However, with the rampant corruption and graft, often, the state'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ief funds do not reach the beneficiaries. A newspaper report said that in a village in Jilin Province, each peasant household was supposed to receive 5,000 yuan from the state's 100,000 yuan relief funds, yet due to corruption, each peasant household got only 50 yuan. (*Apple Daily*, 23 March 2005, quoting *East Asia Economic and Trade News*.)

The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cadres is a heavy burden on the ordinary folk. Cadres at the level of the county or below number 13.16 million, which means 26 ordinary people support one cadre. The total number of government-paid cadres is 45.72 million, and expenses over travel, reception and overseas training and visits used up, respectively, 300 billion, 200 billion and 250 billion yuan. (*Ming Pao*, 7 March 2005) It is also estimated that the debt of all village and township governments in China totaled 1 trillion yuan. The figures of the Agricultural Ministry show that up to the end of 2004, rural population was about 930 million, and rural debt was equivalent to 1,075 yuan for each peasant, which was about 40% of their annual income.

With rising social discontent, the government has gone for further political repression.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has stepped up, but this can hardly suppress the people's voices demanding justice and political reform.

香港	2	唯有實行雙普選,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的爭議和難題.本刊評論員
台灣	4	《反分裂國家法》大受台灣人民反對..... 振 言
中國	5	民眾反日 政府壓制..... 軍 行
	7	新《信訪條例》實施前的掃蕩(轉載)..... 中國人權
	8	中共能否建成和諧社會?..... 張 開
	12	中國今日的婦女—訪談中國女工網絡積極份子..... 路 絲
國際	15	向遭受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國民民主陣線威脅 的菲律賓左派伸出國際援手.....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
	16	以奪取政權改變世界—在歐洲社會論壇上的爭論... 赫爾斯
	18	美國:反戰鬥爭正在繼續..... 美國《退伍軍人報》
	19	從東京灣事件到極大殺傷力武器..... 喬·米勒
書評	20	新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 斯密斯著 兆立譯
理論	25	不斷革命在新世紀的相關性..... 勒維著 兆立譯
	29	關於《歷史不會停 信念不會改》一文的更正..... 兆 立
特譯	30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五) (第十二章)托洛茨基其人..... 曼德爾著 兆立譯
英譯	36	Can the CCP build a society of harmony?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2 ISSUE 1 2005.4.30

Hong Kong

- 2 Only with universal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ure and Chief Executive
can the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 resolvedOctober Review Commentator

Taiwan

- 4 "Law to counter split of the country" is opposed by the Taiwan people..... Zhen Yan

China

- 5 The government cracked down on the people's anti-Japanese movement.....Jun Xing
7 Sweeping off the petitioners before the "Petition Act" is implemented (reprint)
8 Can the CCP build a society of harmony?Zhang Kai
12 Women in China todayStephanie Luce

International

- 15 The Filipino left threatened by the CPP-NPA-NDE; exten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16 European Social Forum: Tak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tr.) Zhao Li
18 The struggle continuesThe Veteran
19 Tonkin Gulf to WMD: Lies, anniversaries, and more liesJoe Miller

Book Review

- 20 Neoliberalism's fatal flaws Review by Tony Smith

Theory

- 25 The relevanc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Michael Lowy

Special Article

- 30 Trotsky as Alternative (part 15)..... E. Mandel (tr.) Zhao Li

Article in English

- 36 Can the CCP build a society of harmony?Zhang Kai